

梁 啟 超

第 三 輯

學 術 先 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歷代名賢
故事集第三輯 梁啓超

定價國幣壹元三角
(外埠酌加郵運紙費)

主編者 潘公展·印維廉

編著者 吳其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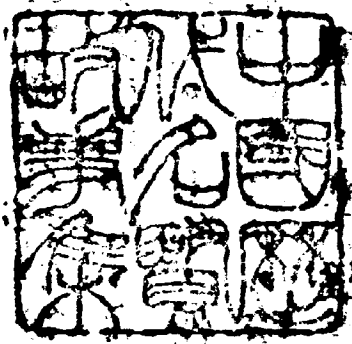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羊市壩十八號

經售處 中華書局
中正開明新圖書局
藝文各地分支局

重慶總經售·文一信書局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版

8001—5000



第三輯

學備先進

梁啟超(上)

梁啟超遺著

勝利出版社發行

作者小傳

吳其昌先生，字子馨，民國紀元前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清光緒三十年三月十一日）生於浙江海甯之硤石鎮。五歲知書，十歲擅古文詞。家貧不能多得書，就里中藏書家借讀，寢饋不釋卷，以是成就特早，而體質亦弱。年十七，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受業於太倉唐蔚芝先生，治羣經及宋明理學。每值例假，必懷炊餅入無錫各公私圖書館，終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年十九，與錫山何門諸子，偕詣姑蘇，受禮經於曹叔彥先生。寒暑間返里，復自杭州至富陽，請益於夏鑾峯先生。民國十三年春卒業，任廣西容縣中學國文教席，時已考成「明道程子年譜」、「伊川程子年譜」、「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輯佚」等初稿各若干卷。翌年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先生考入爲第一屆研究生，從海甯王靜安先生治甲寅、金文及古史學，從浙會慶任公先生治文化學術史及宋史，備受二先生之獎掖。十七年，任南開大學文史教席。時陳寅恪、趙元任二先生講學清華研究院，先生常診察假返平，聽班聽講不輟，同學嘆其辛勤。十九年，任清華大學史學講師。明年瀋陽曠作，東北軍省相繼不守，先生亦自時艱，憂思日深，至爲絕食。二十年，任國立武漢大學史學教授，益盡力於甲寅、金文之學，著有「殷墟書契解詁」十卷、「金文

歷朝疏證」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證」六卷、「金文世族譜」四卷、「金文名家疏證」四卷；其他關於訓詁、音韻、目錄、校勘、箋釋、史傳之專論，散見於各學術期刊者，亦百餘萬言，而詩詞古文及經世之文尙不與焉。擬撰而未成者，尙有「金文方國疏證」、「習語疏證」、「職官疏證」、「禮制疏證」等若干種。先生於其所著述，曾「自比於屈子哀郢、韓非孤憤之遺注」（「金文世族譜」自敘語），可概見其志。由是先生體益弱，而學益勤，憂益深，積久遂以成疾。旋抗虜戰起，先生與奮異常，除兼任中央幹部訓練班教官外，講演撰文，口誅筆伐，不遺餘力。明年武漢大學西遷，先生隨校徙居蜀西樂山，漸患腦血症，常於咯血之後、發熱之際，扶杖上課，工作不輟，甚或過勞暈厥，稍息即崛起寫作自若。家屬友好有勸其節勞珍攝者，輒以「國難嚴重，前方將士效命疆場；後方教授當靈球於講壇」爲辭，故自任教授以來，十餘年未曾休假。常謂「不至抗戰勝利之日，決不休假」。蓋先生實一熱血沸騰而不及自計健康之愛國志士也。三十二年春，力疾赴陪都，出席中國史學會及史地教育委員會，中途即大病，比返樂山，咯血甚劇。然埋首撰述，未嘗稍解。連冬疾甚，猶強自振作，爲本社手撰「梁啓超傳」，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致書本社潘公展、印維廉二先生曰：「去歲接承賜書，並承下問賤疾，感何可言！其昌受命奮興，時病正烈，學校正課，至請長假。

而猶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規畫結構，創造體例，起草草藁，雖在發燒、吐血之日，亦幾未間斷，其事至苦，因之效能遲緩，屢經交與之期，甚用愧對諸公耳。近兩月來，幾於日夜趕撰此稿，朋友勸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將上冊三章五萬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負責、確實、認真三義堅守不撤之故，乃至課期；更因疾病纏綿，時撰時輟，甚望二公深切體諒。本書爲其昌嘔血鏤心之著述，雖片言數字，未敢稍苟，亦以聊報二公辱命之雅，並冀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也。同月三十日，先生貽書友人候擇朱生亦云：「潘公展、卽維廉二先生囑撰『梁啟超傳』，十二月中旬開始動筆，一口氣寫五萬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體太弱，寫四五天必須休息一天，辛辛苦苦，辛苦！」其篤於師情，殫精著述，可以概見。卒以體質久虧，一病不起，發梁傳上篇，竟成絕筆。三十三年二月廿三日，病殞樂山寓廬，年僅四十有一。遺妻一、女一。至梁傳下篇，將由先生介弟世昌先生續成，以完先生未竟之志。先生平昔文章播海宇，交遊徧朝野，一旦棄世，各方同深悼惜。以先生天資之敏，好學之篤，使天假以年，則其對於學術之貢獻，將復何限！乃造物忌才，致先生寶志以毀，實學術界一大損失也。

勝利出版社編審組謹識 三十三年五月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興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價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自由憤外而顛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 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天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兩旁。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義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備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鑲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絕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道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加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融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歷史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遺失，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學士都可以「有爲碧嶽蒼岩」。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推諱乾坤，假使有許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着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遺棄故事雖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德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始爲我民族文化的精品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輯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目次

第一章 一世紀來中國之命運

第一節 緒論………

第二章 第一節 梁氏在滿洲國十餘年的慘況………

陷落於絕望之深淵——天災。人禍——道德的墮落——思想

文體的顛倒——民智的墮落——社會的腐化——太后的奢靡

軟弱體——梁氏在滿洲國時期的特權——外交的腐敗——軍隊的黑暗——實業

善的萎萎——貪污的普遍

第三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教養狀況………

總一覽

童年生活是怎樣的——青年教育是怎樣的——官辦「洋學堂」是怎樣的

第四節 梁氏後來對於祖國命運的影響………二七

文體的改革——報紙的改革——新興各報述評

第二章 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

——從梁氏誕生至戊戌政變

第五節 綜敘………三三

第六節 亡國現象的種種——梁氏生後的中國慘況………三四

禍根的溯源——延續的「災人禍」——此年的國際形勢及世

界大勢——中國遭受瓜分的「史蹟表」——帝俄侵華的陰

勳 由於革命高潮的亢進 由於偏向新與論的成熟

第十一節 戊戌政變史劇的繪影 …… 一〇一

痛哭流涕時代的最後請願——新政要綱一覽——磨折的警

報——譚·袁半夜的壯劇——皇帝成俘虜了——廢立陰謀

與「單片請安」——譚嗣同精忠壯烈的芳躅——千秋肅敬

的劉光第父子與林旭夫婦——康廣仁楊深秀楊銳三君子的

忠烈

第十二節 政變失敗原因的解析 …… 一二七

清德宗的無權與無能——康有為本身的缺陷——滿族的排

斥與破壞——守舊分子的死力阻撓

梁啓超

吳其昌遺著

第一章 一世紀來中國之命運

——從鴉片戰爭至梁氏誕生的前夕

第一節 緒說



子說：「知人論世」，我們要知道一個人全部的事業，了解他全部的心境，欣賞他全部的風度，認識他全部的學問，然後才能公正地評判他生平價值。所以我們要做這個人的傳記，必須暫時把我的神魂，鑽入這個人的時代，並立於這個人的環境，透視了這個人的情緒、性格，然後能作親切有味描寫，客觀無私的綜述。並

且才之成功一部鮮活的信史。

中國這一百年來（一八四二——一九四三）的命運，真正是從樂士跌入了地獄，又從地獄爬回到樂士，一個兩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轉捩期。在這幾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雖然內部已經空虛，但外表承乾嘉徐蔭，還是一片光輝燦爛。南京條約以後，鐵血為一條枷鎖！割了第一塊骨肉！以後一條一條的綁上無量數的枷鎖；一塊一塊的割了無量數的骨肉！受着這樣「凌遲」的慘刑，簡直墮入地獄的底層。最痛苦悲楚的時期，正在這一百年的中間。自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戰，至庚子（一九〇〇）義和團之役，那時瓜分的酷刑，已為全世界所宣判定了。稍有血性的國民，都悲蹈東海。自魏：陳天華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鴉片超，正是生長在這個最黑暗地獄底層的有血有淚有志氣的一代滿身創傷的青年。他也屢次想跳海而死，但他堅決地相信中國必然不亡，並且斷然。與。所以他在全然無望之中，拚扎奮鬥。但是，可憐，他到死始終不見義師的統帥再興。他是在最黑暗地獄中過了一生的「盲魚」！雖然他的心是不盲的。別人我不知道，但我面處在魏氏的時代，我

恐怕要終日顛哭嘔血而死丁。

第二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況

一 陷落於絕望的深淵

我們現在來回頭看看梁氏的時代與環境……

「……我國民全陷落於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官吏，官吏失望！希望政黨，政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憂國之士，溢其熱血，絞其腦漿，於彼乎？於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無一路之可通；而心血爲之倒行，腦漿爲之替亂！……」（飲冰室自由書）。

所以康有爲吟着「或勸蹈海未忍淚，且歌憤誓習人間」的詩，後來梁啓超還是告其友明水「使中國而誠無可爲，我惟有蹈東海以死耳！」到底當時環處的現狀是怎樣的呢？西洋浪人所常常舉例宣傳，乃至照片繪畫的：鴉片、八股、小脚、長辮、管管、殺頭、花酒……

磕頭等徵狀，這是最粗淺的有形的外症，人人所知道的。如果稍微放眼深刻的一看，弄得更可惡了。

二 天災・人禍

放眼先展望那時代整個的國家，則是：

「……地利不闢，人滿爲患。河北諸省，雖歲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多，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絕，運賑無術；任其委填，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鬻身爲奴，猶被逼迫……馴者轉爲疥癩，黠者流爲盜賊。教匪會匪，蔓延九州。工礦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八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論不變法之害）。

三 道德的墮落

以上還可以委之於自然及外來之災禍！然而亡清末年的「漢族奴才」，經過三百年滯留的大淫威的壓迫，爲製造奴隸性的政策，居然成功；我羲黃神農，那時不免大部分呈觀

着可悲痛的症状。「因明集」有一首古樂府名「奴才好」，刻畫得透澈淋漓：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莫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三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得聽得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蕙，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遇事我也會。內地只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我輩奴僕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歸。『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屢改；『大德』『大法』『大日本』，換個國號任便裁！奴才好，奴才好，世有強者我使服！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爲端端。……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變變索？……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處皆爲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這是將智由先生沈痛的血淚，今日吾輩青年讀之，真欲怒髮衝冠，而在當時可並不認爲嚴重的怪象。這種「嚴重的怪象」，真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決不是含血噴人的污

護，危詞聳聽的肆談。

四 思想的顛倒

遠在梁、蔣以前，以謹慎著的郭嵩燾，已記其親眼所見云：

「……及至京師，折於喧譁之日，驟不待發。竊謂中國人之心有萬不可解者：而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設中國之具也，方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乃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來，國家之恥，耗竭財力，無一人引爲咎心。鐘鼎玩具，家家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值，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國剛（紀澤）乘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船起而阻諱，數年不息。是有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腴吾之膏脂；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郭嵩燾集：「與李鴻章書」）。

五 民智的困窮

越十餘年，梁氏之所親見的，又變本加厲了。他說：

「……吾少而居鄉里，長而游京師，及各省大都會，頗盡識朝野間之人物。問其子弟，有知國家爲何物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入泮，如何而可以中舉也。問其商民，有知國家之危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謀利，如何而可以駟人也。問其士夫，有以國家爲念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館地也。問其官吏，有以國事爲事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某缺肥，某缺濬，如何而可以逢迎長官，如何而可以盤踞要津也。問其大臣，有知國恥，憂國難，思爲國除弊而興利者乎？無有也！復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驥，頤指氣使，窮修極欲也。……於廣坐之中，若有談國家者，則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癡人也。其人習而久之，……則亦自覺其可恥，箝口結舌而已。不恥言利，不恥奔競，不恥媒瀆，不恥愚陋，而惟言國事之爲恥！習以成風，恬不爲怪，遂使國萬萬人之心，與無一人等！……」（愛國論）。

任公先生豈不知道，這「莫談國事」的惡風，乃是滿洲皇帝三百年來殺頭淫威禁制的結果。過去我在北平讀書的時候，還見到西直門外小茶館裏的黑牆上貼着前清時代尚未廢去的條禁：「莫談國事」！但是痛心的，想不到吾民族承受這淫刑的結果，竟養成爲「無恥」！春秋之譏：「蒙大辱以生者，無寧死！」莊子之言：「哀莫大於心死！」那知道吾民族受淫威、蒙大辱以後，竟由心死而變成無恥，所以革命的大業，一直要等待 國父的領導，才能完成啊！

六 社會的腐化

這種無恥的怪象，延續到後來，尙爲梁氏所親見，他分別的記着：

「……越等無恥，故安於城下之辱，……而不思一雪；乃反託虎穴以自庇，求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而敢以司理。警蹙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耄頹，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果栗變色，聽言若聞雷，視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

滯滯若弱豕！……士惟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題」；廿四房之容，以受收買。抱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
之奧！商惟無恥，故不講製造，不務轉運；攘竊於室內，授利於漁人。其甚者習洋文
爲奉承西商之地，入洋塾爲操練買辦之才。充犬馬之役，則耀其鄉里；假狐虎之威，
乃轢其同族！兵惟無恥，故老弱羸弱，苟且充額。力不能勝匹雞，耳未聞譚戰事。以
軍資十年之密，飲酒狎花；距前敵百里而遙，望風棄甲！民惟無恥，百人之中，識字
者不及三十。……五印毒物，天下所視爲虺爲鳩，乃徧國種之，徧口嗜之；男婦老
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纏足陋習，……習之若性！……」（知恥學會序）。

又記：

「……學校不立，學北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尚；語以
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難，治生無術，習於賤恥，膏不知怪。兵學不講，綠營防
勇，老弱癯煙；兇悍騷擾，無所可用。一旦軍興，臨時募集，半屬流丐，器械虛苦，

體稍微薄。偏得以上，流品猥雜，一字不識，無論讀書。營例不諳，無論兵法。……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官弊蠅起。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制控按，一事不舉。保獎濫混，露時充塞；朝爲市儈，夕登顯秩，官途壅滯，候補塞途；非鑽營奔競，不能謀飽。俸薄微薄，供億浩繁，非貪污惡鄙，無以自給！限年繩格，雖有奇才，不能特達；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氣已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爲患。……」（論不變法之害）。

梁氏雖痛哭流涕地嘆着：「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然而那時的全國，充耳不聞，這也許天將滅亡滿清政權的表徵。

七 太后的奢靡

回頭看看那時滿清政權的最高主宰，所謂「慈禧太后那拉氏」這老物，則正敲榨我們全體同胞的汗血，出賣我們祖國百年命運的代價，來揮霍她個人淫樂的享受。用創辦海軍的專款來修造頤和園，只是最顯明的事。此外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彌天糊塗賬，例

如：

「……乙未至戊戌間，凡借外債五千萬磅，除償款外，所餘尚一千二百十七萬磅有奇。辛丑以後，各省每年解一千八百萬。於北京政府，每年所解者七百餘萬。及今年，亦二千萬有奇矣。此等款項，用諸何途？……乙未至庚子，和園續修工程，每年三百餘萬兩。皇太后萬年吉地工程，每年百餘萬兩。戊戌秋間，皇太后欲往天津開操，命榮祿修行宮，擬「昭信股票」餘款六百餘萬兩，辛丑回鑾費，據各報所記，二千餘萬兩。辛丑發動工興修之佛照樓（按：後來之居仁堂）工程，八百萬兩。今年（一九〇三）皇太后七旬萬壽慶典，一千二百萬兩。另各省大員報效，一千三百萬兩。即此舉舉數端，專為一人身上之用，我輩所能知者，其數已達九千萬兩。未始者復何限。……國民乎！國民乎！公等每年統一千三百萬之膏血，為北京城內一人（那拉氏）無用之私費，公等節衣縮食，拋妻鬻子，以獻納於北京，為彼一人修花園、慶壽辰、築墳墓之需也！……」（中國國債史）。

第四、吳佩之 朝廷和香鼎

（滿珠層的曉聲逸樂，其肺肝既如此；輔翼此淫后老怪之元老大臣則何如？譬如戶部尚書張敬瑄，千方百計籌餉浮款，竟爲國家創辦海軍，新皇太后天大向他開錢，老大不快；把敬瑄了事。這一樁事，而除「混蛋」——如李鴻章——及「惡霸」——如榮祿等——以外，其餘都不存。存在的「混大老」呢，請你看：

而請：一……這酒本人謂我……操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戰幾十年「入股」，非寫幾封「字許」酒樓也，非當幾十年差，非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工儂，非幾幾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在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八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理。須三四人左右，扶之提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國事，是何異立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其輩自去少壯之時，已不知亞、歐、非、美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

破：

是那皇帝，猶其前所費之三千萬，極又必撻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寒，氣息奄奄，與鬼無異之時，然後將我一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毀其手！嗚呼！

「面微帶赤，其數年之八股，白摺，當差、誦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手辛萬苦，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之。如乞兒拾金，舞盡雷盤旋頂上，而兩手繪緊抱其荷包，他事亦所顧、非所知、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舉亡矣，舉分矣，而我今年說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若不得已，則割三省兩省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三五日高之人民，作奴爲僕，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望，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在矣。」（少年中國說）。

九 外交的腐敗

至於最重要的周旋世界、新術利權、掌握國防和戰之權機、控制國家存亡之命運的機構，叫做「總理衙門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將是何種狀況呢？那更妙了，素有「混蛋加三級」之雅號（北京飯館裏，「水燉蛋」加上雞丁雞片雞絲——三雞——這碗菜就叫「總理衙門」）。大家所親見的：

「……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己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謂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趨而歸，一無學識。……」（政變原因甚密難）。

這實在是千真萬確之事，當時曾有「把九龍弄到澳洲東南」的笑話，因為澳門與澳洲，這班「老王爺」實在有點捉不清楚！「使」「領」之由奔趨而得，也是事實，以出使日本的爲尤甚，只是把「提督學生」，「殺革命黨」，爲惟一要務。當時一位留日學生——筆名「東亞傷心人」——做一首新樂府，名「哀星輅」，譏使臣「獻書蓄意殺學生」，附帶敘

遞使臣的出身？說：

「……他這當日好是背了背，販賣西洋貨，相公堂前，袖裏裏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裏憂，肥奴心裏喘，手裏親捧留聲器，裏裏裏裏裏。翁在衙門賣卦，兒走上房司門；兒作商人，紫衣金章，綠巾……」。

二〇 軍隊的黑暗

「若以論兵論之」，那末：

「……用洋將統帶訓練了，賜與權洋人。國家歲糜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將者，則如查福祥之類，難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懲罰。否則勝者，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獵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改變原因，容難）。

上面這段話，沒有一字是虛說，甲午戰爭則慘敗在這裏，據上。

「……據英人蒞臨德（國）的記述說：『在戰爭發生前二年，漢納根（李鴻

章部下服務的德人，請李鴻章購買多量克魯伯廠所造的大開花彈，供戰鬥艦上大砲之用。李已發了命令，但是終於不曾實行。……當黃海海戰時，至有兩艘戰鬥艦，英國只有三顆大開花彈！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戰當中，中國戰艦六口徑的巨砲皆開攔不能作用。至於中國自己製造的魚雷，據嚴復所說，有用鐵渣來代替火藥裝在裏面的上海軍李鴻章，用全力經營的，內容的腐敗如此；陸軍就……用說了。……（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一 實業的叢弊

再換一個方面，就當時推行關於經濟建設的新政來觀察：

「……以開礦論之，……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出弊；各省礦田，只為候補人員『領乾脩』之用，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

「……中興舊例：官神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謂之『乾脩』。凡各省之『某

某局總辦」一某某局總辦」，無不皆然」」（政變原因答客難）。

「三：官至興一利源。則官與商爭。紳與民又爭。舉一新政，則政府與行省爭。此省與彼省又爭。議一創舉，則意見歧而爭，意見不歧而亦爭。究之陰血周作，張脈債與；旋動旋止，祇視為痛癢無關之事！……」（南學會敘）。

所以清末「官商合辦」的，或是「官督商辦」的經濟建設，沒有一件不是徹骨失敗的。後來川漢鐵路的建設，可憐路基已經鋪到宜昌，只因「官與民爭」，就擴大為清廷覆亡的致命傷。

一二 貪污的普遍

如果我們看完了官場中的上層階級，還覺得未能惡貫滿盈，不妨再走入普通官場，看看中下層吏曹郎官的官般風氣：

談者曰：「查前此京朝士夫，樸素如老儒。入署太率步行，宴客不過數盞。歲得俸廉數百金，尚足以自給。其名士，往往敝衣破帽，蕭然自待。而舉國且仰其風采也。

（說國風中）。

如果長能如此，那也罷了。但是到後來呢？呵，但只見：

「……今也，全國富力，有日蹙而無日舒；而中流社會之人，日相炫以豪華。雖以區區一曹郎，而一室之重設，耗中人十戶之賦。十席之飲宴，值存典半年之俸。而其尤宜達者，更無論也。」（說國風中）。

所謂「其尤宜達者」淫奢滔天的罪惡，你如果不信，請你一讀薛福成「庸齋筆記」裏面的「河工奢侈之風」條。

「……老於河工者為公談：……存歲經費，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諮詢。其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鬥奇爭巧，窮奢極侈。即河宴席費之，一豆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豬肉也，而有五十餘種。……（中間敘述種種罪惡甚怪甚詳，不特汗我文筆，從略。）食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趨

去，從來有絲席。……此種宴席以為奢，而其餘若服車馬玩好，豪華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有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宴幕必數十百人，遊客或窮途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贈，汎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更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自爲棋、博、樗蒲之戲者，得赴賬房領費，皆有常例。……新點翰林，有齋朝貢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爲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藩人拔貢，有謁京員一紙書謁庫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污吏之驕奢淫儻，天下安得不貧苦！……」。

其他如外人所譏，太監安得海、李蓮英等之壽酒后淫穢禍國，那更甚於此！養成亡清「全國官場」的國風，貫徹上、中、下，不特貧、窮、富，一樣的：

「……前此偶有遊戲，諱莫如深。今則樗蒲之博，以夜繼晝；狹邪之遊，張旗鳴

於。職務。手解飽。神志昏於錢錢！而舉國未或以爲非也。前此賄賂苞苴，行誣塞，國夜者受者，咸有戒心。一則攫金於市，載寶於朝，按圖索驥，選謝論價，恬然不計以僞恥，而遂以此夸耀於其前輩也。……」（說國風中）。

第三節 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教育狀況

夠了！這本「地獄底層的官場現形記」的電影，在此重映一通，青年們！會使你哭笑不得，顛淚倒流，是不是？你看了這本電影，你才知道清末的志士仁人，革命英烈，所拋的頭顱。所噴的碧血，其意義如何的壯烈偉大了。國父，自然是披偉大的建國成功者，而梁啓超替九死一生，首先發難，勇往直前的衝鋒。他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但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勳勞，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這些暫且擱起，這電影還有下半本，是當時「地獄底層的文化界現形記」，也請青年一看。

還在梁氏四歲的時候，美國的電話已經裝起來了，而同時在中國呢，

「……記得光緒二年，有位副使英商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說：『大概說的是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嗚呼，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得朝廷奉旨燬版，才算完事。……」（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

更前十年（同治六年），宰相名儒倭仁，反對李鴻章在北京設同文館的怪事，那更不必說了。

一三 童年生活是怎樣的？

既然全國沒有半個學校的教育，我國民自「童年」以至「青年」最寶貴的一段光陰，所受的生活薰染是怎樣的呢？

「……若其苦於嬉戲之時，習安房闈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耳目之間所日與爲緣者，含牀、寶篋、寶篋、至猥褻瑣之事，概乎無所聞見。其上焉者，教之以得科第，保祿。

利；誨之以顯產業，長子孫，斯至矣。故其壯也，心中目中，以爲天下之事，更無有太於此者。其方意室，同病相憐，冥冥之中，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恥，固陋野蠻之天下。……且恬然不以爲怪。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下，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較，其志趣學識，必有非此輩之所能望者！豈其種之特異哉，無亦三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論女學）。

或說：梁氏所描寫的，還是中上階級社會中青年子弟所遭際的情形，自然還有更慘於此的下層社會的貧苦子弟，他們所受的生活薰染是怎樣的呢？現在將本這沒有描繪此類的速寫，我只有請你讀一讀後來魯迅所收集的「阿Q正傳」、「藥」兩篇文章來彌補這遺憾。

……：遺風相傳下來，江甯的小康子弟，在老祖母的監護之下，淳淳地教訓他道：「不許去鴉片館，可以在家設賭盤，抽大煙。不喜去嫖，可以練一個合羣的「丫頭」或「密姐」，討一房小婆娘侍者你」。這類的慈訓，社會上都是稱爲「教子有方」的。不多幾年，這白面少爺，已經是弄到骨瘦如柴，家蕩產盡，先於老祖母而死了。

等到「教」有方，「道」位老，太死時，棺可斂，躺着尼姑庵的「施棺材」而了結。這類為社會家庭處理的青年，作者的限內，還親見小小一鄉鎮內有數十倍之多。

一四 青年教育是怎樣的

如果家內出了有志青年，那末也有一黃卷青燈，十年苦讀」的學子。但是我們來看看他埋頭十年，疲極竭時，所下苦功的對象，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所謂「八股文」、「八韻詩」。「八股文」這神祕的名詞，我們聽得爛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明中葉以後，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講之格。雖名為說經之文，實則本唐代詩賦，專講排偶聲病。如宋元詞曲，但求按譜填詞。而蕪詞謔言，鉤掛榘枝指，又甚焉。……格式既定，務使千篇一律；稍有出入，則謂之不如格。是以習舉業者，歐陳相困，塗塗遞附；黃茅白草，一與皆同。限以『三百』『七百』之字數，均以『連上』『犯下』之手法。雖胸有萬卷，學貫三才者，亦必俯就格式，不許以一語入文。其未嘗學者，亦能揣摩聲調，敷衍講章，弋獲巍科，坐致高位。

……（楊瀚春侍御奏稿：「請釐定文體摺」）。

獨清未更可笑了，更……竟以「遊戲文章」公然作爲國家登進人材的標準。而其遊戲的下流不通，還還有「詩話」、「詩鐘」、「酒令」、「牙牌」之下！全國白晝踐踏這種文妖，真使人感覺着「清室不亡，是無天理」的！

「……更有甚者，各省歲科、童試、縣考、府考、院考，多出『截上』、『截下』、『無情』、『巧搭』等題（例如『子見南子，自牖執其手』之類）；割裂經文，瀆侮聖言。……而各省常用，毫不爲怪。此種文體，……起、承、轉、收、擒、釣、渡、挽，其法視文網爲尤密，其例視刑律爲尤嚴。遂使天下百千萬億之生童，日漸磨精力於此等手法之中，舍織入機械之外，無所用其心，恐有旁鶩而文法因以疏也。……」（楊瀚春侍御奏稿：「請釐定文體摺」）。

這位因變法而喪首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於是喟然長嘆道：

夫天下之士，莫多於生童也。蓋廷之公卿，皆起自生童也。而其用心及其所學如此！遍天下有用之才，而入於無用之地；一旦而欲舉以任天下之事，當高國之爵，其可得乎！」（同上）。

至於「八韻詩」的內容，尤爲荒謬，不必多講；而其荒謬可笑者，以現代人之方音，而必須押韻。唐時代之韻脚，無理取鬧如此，而反認爲天經地義。所以聲韻是用機筋來硬記的，不用耳朵來聽的！以致名震一時的老詩人，往往鬧出「出韻」的笑話：

「湖口高碧涯，大令心變，少有才名；其駢文書法及散體詩，均造深際。……殿試兩次出韻，皆在「十三元韻」中；遂與四等。衡陽王紉秋闈選，則以詩曰『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庸齋筆記）。

這算是活埋青年、活埋天才的秦坑！

一五 官辦「洋學堂」是怎樣的

後來，滿清政府也辦了「洋學堂」了。可是，民說：「上洋學堂，會給洋人挖去眼睛

的」，絕對不來。小康之家，上學「養德」，更是聞「洋學堂」之名而唾口水！梁氏記

看：

「……前清末年輕學堂，……費、膳費、書籍費、學堂一籠子，還倒貼學生膏火；在這種條件底下招考學生，總是考兩三次還不足額。……好像拉牛上樹！」（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洋學堂」竟像「拉夫」一樣的拉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學生了；以後又怎樣樣呢？……」

「……但教方言以作翻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聰穎子弟，曾以入學爲恥，能得前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國中，不事德教，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傳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游惰以衣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

（政變原因答客難）。

可不是嗎，梁氏的預言，竟成爲仙識，當年北洋官費學美培植出來的學生陳錦濤，老而不

死，豈「爲漢奸以傾國基」！而且，後來比較規模複雜的學堂，開得也有督辦、總辦、會辦、坐辦各大員的怪象。除了坐辦外，至在設內像個校長模樣以外，督辦大臣等，都是「身滯京邸」而等遙指揮滬、粵各校。譬如南洋公學的監督、總辦等，換了八九個，終未出北京一步。至唐文治帶續辦出京蒞校，一時驚爲奇事，而有「模範堂長」之願！

那時「文化界現形記」的電影，如此如此。所以國父要手創學校於日本橫濱，後來就交給梁氏去辦理，此即名振一時的「大同學堂」。

第四節 梁氏後來對於祖國命運的影響

在這樣地獄底層的教育狀況，向後再看看康有爲的「萬木草堂」，雖然不過是一處規模轉大的「經館」，雖然「草堂學則」上所定的課程依然不脫頑固老儒的氣味，而在當時，誰也自爲這是地獄底層的一盞點起的明燈。再往後看看陳寶箴、黃遵憲、汪精、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在長沙合辦的「時務學堂」，那便算地獄底層的火種了。

鑒於被迫而敷衍的欽辦東師大學堂，那又是一座空爲高坐的衙門，掛監入學的尾閘，與「樞閣」二字，如風馬牛。一直要等到蔡元培先生來做校長，才算整頓而上軌道。

二六 文體的改革

著論文體的改革，梁氏的功績，實在是他最偉大的所在。梁氏校後，胡適送他的靴腳說：

「文字成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青年。」

繼梁氏而起，而作更進一步的文體改革者，便是胡氏。所以胡氏對於任公這點上的功績，認識得特別清楚。不錯，你看了前面楊深秀所描繪、全國青年所搖頭擺腰而吟哦的八股文，裏內容的妖模怪樣，醜態齷齪，已經領教過了；若再跳出圈子來看看當年一班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體改革運動，如寒風凜烈中，紅梅、臘梅、蒼松、翠竹、山茶、水仙，雖各有各的芬芳冷豔，但在我們今日立於客觀地位平心論之：譚繼同之文，李開宸

靡壯麗頹豔，而難通俗。夏曾佑之文，更雜以莊子及佛語，更難問世。章炳麟之文，學王充論衡，高古澹雅，亦難通俗。嚴復之文，學漢魏諸子，精深邃密，而滯且大氣魄。林紓之文，宗稽柳州，而恬逸條暢，但只適小品。陳三立、馬其昶之文，詭譎桐城，而俗局不宏。章士釗之文，後起不潑，忽固執桐城，作繭自縛。至於雷鳴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風雲，震撼心魂；時或哀感曼鳴，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憤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髮衝冠，或熱淚溼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啓超之文如此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論，亦惟有「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約一八九六——一九一〇）如此耳。在此十六年間，任公誠爲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也。革命思潮起，梁氏的政見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的魔力感召的文章，也就急遽的下降了。可是就文體改革的功績論，經梁氏等十六年來的洗滌與掃盪，新文體（或名報章體）的體制、風格，乃完全確立。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而勝禮祠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一七 報紙的改革

學校外，推廣文化權一利器，則為報館。補助教育，啓發民衆，指導社會，介紹科學，宣傳主義，主持公論，監督行政，糾彈非法，為民喉舌，……這許多神聖工作，都要報館來負責實行。然而國家的報界狀況又怎麼樣呢？凡是沒有「洋人」與「租界」的都會，一概沒有報紙：

「……京都首善之區，而且歸軍割據以前曾無報館，此真天下萬國之所無也。每省之幅員戶口，皆可敵歐洲一國，而除廣東、福建外，省會之有報館者無一焉。此亦世界之怪現象矣。……」（清議報一百冊祝辭）。

有「洋人」與「租界」的都會，才有模仿洋人而辦華文報紙的。梁氏說：「近年以來，陸續相接，惟上海、香港、廣州三處，號稱最盛。……」然而這類操於出身八股的無聊「文丐」之手的華文報紙，內容又怎樣呢？

「……每一展讀，大抵：『滬濱冠蓋』、『瀛音南來』、『祝融肆虐』、『圖繙不

成』、『驚散鴛鴦』、『甘爲情死』等字樣，闕塞一面，千篇一律。甚者乃如臺灣之役，記劉永福之娘子軍！團匪之變，演李乘衡之黃河陣！明目張膽，自欺欺人。觀其論說，非『西學原出中國考』，即『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論』也。展轉抄襲，讀之惟恐不厭！……」（同上）。

我想現代有志青年，看着這樣嘔飯而又窩心的報紙，也要讀之惟恐不厭！

一八 新興各報述評

報紙的改革，與文體的改革，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當時梁氏創辦「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於上海及日本。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等創辦「湘報」於長沙。陳範、蔡元培、章炳麟、章士釗等創辦「蘇報」於上海。嚴復、夏曾佑等創辦「國聞報」於天津。日本留學生創辦「譯書彙」，「國光報」，「開智錄」等於東京。張謇等創辦「國民日報」於上海。其後爲國父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在國內、國外創辦了大量的日報與雜誌，如「中國日報」（香港）、「民生日報」（檀香山）、「大同

報」(舊金山)、「中興報」(新加坡)、「革命軍」(鄒容作)、「慘世界」(蘇元琪作)、「蕩虜叢書」(章士釗編)、「陸沈叢書」(陳去病編)、「黃帝魂」(上海)；及「漢幟」、「漢聲」、「江蘇」、「浙江潮」、「新湖南」、「警世鐘」、「二十世紀之支那」(東京)等。就形質言，收穫了「報紙改革」的成功。就超越的意義言，同時收穫了「文體改革」的效果，並且即文體改革爲工具，爲利器，連帶收穫了「政體改革」的成功，以至「國體改革」的成功。

第二章 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

——從梁氏誕生至戊戌政變

第五節 緒論



清同治十二年，即公曆一八七三年，梁啟超生於廣東省新會縣崖山附近之鯤子鄉。字卓如，後來改字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

這一年，是怎樣的一個年頭呢？中興偉人曾國藩已在前一年逝世了，左宗棠已六十三歲，李鴻章已五十一歲。梁氏的重要師友：李端棻四十一歲，黃遵憲約三十四歲，康有為十七歲。現代史上主角與梁氏有關係者：亂世奸雄袁世凱十五歲，建國 國父中山先生八歲。戊戌成仁六君子，可考者：楊深秀二十五歲，劉光第十七歲，譚嗣同九歲，林旭後一

卒生。梁氏晚年學友王國維後一年生，弟子蔣才震後七年生，蔡鈞後八年生。後十四年，而今續載。蔣公誕降，遺碎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所戴之枷鎖，而將獄底層層磨碎之。……給諸一縷曙光之湧現！

第六節 亡國現象的種種——梁氏生後的中國慘況

一九 禍根的溯源

此時就中興的命運而言，正如轉巨石於危崖之上。……廿次回喪類，梁氏自述說：「……請觀百年以來之專：乾隆中葉，山東教匪王倫之徒起，三十九年平。國時有甘肅馬明心定亂，據河州、蘭州，四十六年平。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起，諸將用征皆無功，五十二年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爾喀又內犯，五十九年乃平。南五十六年，詔天下大索白蓮教首領不獲；官吏以搜捕教匪爲名，恣行暴虐，繼滿天下。五十九年，貴州苗族之亂遂作。嘉慶元年，白蓮教遂大起於湖北，蔓延

湖南、四川、陝西、甘肅，而四川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擁衆數萬起事，至七年乃平。八年浙江海鹽蔡牽又起。九年，與粵之朱洪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粵之鄭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數年，而閩粵之亂又起，凡亂十餘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同時湖南之趙金龍又起，十二年平。天下形勢極極，而鴉片戰役又起矣。十九年英艦始入廣東。二十一年取舟山、廈門、定海、寧波、乍浦，攻吳淞，下鎮江。二十二年結『南京條約』乃平。而南虜伏莽，已無遺用沒無寧歲。至咸豐元年，洪楊遂乘之而起，蹂躪天下之半！而咸豐七年，復有英人入廣東，楊總督之事。九年，復有英法聯軍犯北京之事。而洪氏據金陵九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黨始逼京畿，危在一髮，七年始平。而同部、前疆之亂猶未已，復屢刃者數載，及其全平，已光緒三年矣」（新民說：論進步）。

二〇 延續的天災人禍

梁氏未生以前的中國國運如此，禍根延續，梁氏既生以後的國運便如何？

「……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爾後民教之鬧，連綿不絕。光緒八年，遂有法國安南之役，十一年割送安南始平。二十年，日本戰役起，二十一年割送朝鮮、臺灣，結『馬關條約』始平。二十四年廣西李立亭、四川台蠻子起，二十五年始平。同年，山東義和團起，蔓延各省，幾至亡國；為十一國所救，二十七年結『辛丑條約』始平……」（同上）。

這種號戰爭流血等慘史而言，而且偏重於內亂方面的。

二二 此年的國際形勢及世界大勢

至於就梁氏生後的世界大勢及國際形勢去觀察一下：這一年（一八七三年），美國南北戰爭平定，重告統一，已經八年，「擠入列強之林」了。日本明治即位，雖新成功，已經六年了。蘇彝士運河開通，英國握世界海權，已經四年了。普法戰爭終止，德國一躍為世界巨強，已經三年了。意大利馬志尼、屈黎波的二傑，進軍羅馬，以後卒造成意國統一之業。正在這年。這許多列強，此時都成爲天之驕子，而合力以對付這東亞老朽昏庸而遺毒

豐富與中國！大者則截肢體，小者則割一瓣，而中國就無辜受着「車裂」及「凌遲」之慘刑！小者如「租界」、「租借地」，今姑不復敘述。其較大而割一肢一體者，如下表：

二二 中國遭受瓜分的史蹟表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 割東海濱省及庫頁島於俄。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 俄私取我中亞藩屬地塔什干（Tashkand）。

六年（一八六七） 俄私取我中亞藩屬地撒馬爾罕（Samarband）。

七年（一八六八） 俄滅我僑民建立之中亞藩國布哈爾（Bukhara-Khan）。

十一年（一八七二） 俄滅我僑民建立之中亞藩國基華（Khiva-Khan）。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 俄滅我僑民建立之中亞藩國浩罕（Khokand-Khan）。

五年（一八七九） 日本私取我六百年太平洋藩國琉球。

十一年（一八八五） 法割我秦漢以來已成內地之安南全部。

同年 英法瓜分我中南半島之藩屬國南掌。

廿二年（一八八六）

英滅我滇民建立木梳朝之緬甸全國。

廿二年（一八九六）

日本割我藩國朝鮮及內省臺灣。

二三 審俄侵華的陰謀

蘇棟及米，剝牀及膚，到了十九世紀除夕（一八九九）的前夜，那風聲愈傳愈緊，中國已成爲列強俎上之肉，只待手起刀落而已！梁氏說：

「……曾不知『支那股份之票』，已駢闐於西肆。『中國瓜分之圖』，已高張於議院！……」（南學會報）。

明年（一九〇〇），二十世紀開始，果然全世界十一國聯軍共陷中國的首都！這真是「開刀大吉」的時候了，然而何以忽然又不瓜分了呢？別的原因雖有，而其中最大的秘密原因，是俄、日兩帝國都懷着不可告人的鬼胎、野心，妄想獨吞中國，而暗中加以破壞。帝俄當時的妄想獨吞中國，可以從東三省佔領後絕對不肯撤兵，及後來與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二事來證明。

二 暴日蓄志亡華的深心

至於日本，人家都以為牠近年來才開始蓄志妄想獨吞中國，但在八十年前，當日本還是一個閉關自守、微弱貧困、「顯微鏡下的小國」的時候，已經企圖「巴蛇吞象」，「蟬蟬撼樹」，早已想獨吞中國，「爲中華王」了。你或者要吃一驚吧？

蠻徒豐臣秀吉，我們不必再談。名聞一時的維新首勳的志士吉田松陰，不身國界，我們是何等敬重他啊！但他在獄中所著的幽囚錄中，明明白白的說：

「……急修武備，艦路具，破路足，則宜開發內諸侯。乘間奪加模、察加、澳都加。設琉球朝貢，會同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州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圖善保國矣。」

這是第一步驟，但還須步步進金之對付南北宋。所以帖中便毫不諱言講第二步驟，說：

「……培養國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鮮、滿州，併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

取償於朝鮮、滿州！……」

你看八十年來日本兇惡的政客與軍閥，所有的一舉一動，那一件不按照着吉田松陰的遺志，按譜踏拍在那裏進行！

說：還有一個比較吉田松陰時代略前的志士，名佐田信淵。他的名著「混同政策」，裏面

「……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當今世界萬國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無過於中國之滿洲者。何則？滿洲之地，與我日本之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處，隔一衣帶水，遙遙相對。距離不過八百里，其勢之易於擾亂可知也。故我帝國何時方能征討滿洲，取得其地，雖未可知；然其地之終必爲我有，則無可疑也。夫豈但取得滿洲已哉！支那全國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韃靼（指蒙古地）以後，則朝鮮、中國，皆次第可圖矣！……」。

我們讀了這樣明張膽的「吞華論」，回頭來看什麼「田中奏摺」內所說的：「欲征服世

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洲」，就可不必詫怪，因為這不過是日本八十年來上上下下人人暗誦的一句口頭禪罷了。

如果有人推諉說，這是在野志士的言論。那末在朝諸侯的言論何如呢？諸侯葛津齊彬評論李鴻章的割棄安南事，說：

「……不問清國一弱至於如斯也！只彼地廣人衆，豈無忠臣義士？而鴉片戰爭以後，政治仍然不整。內有長髮之擾，外被英、法之侵；割地請和，天子蒙塵，謂非恥辱之大者耶？我國介在東陲，誠不可不早爲之備。英、法既待志於清，勢將轉而向東。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出師，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據地於亞東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勇武於宇內！則英法雖強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夫清國沿海諸地，關係日本國防者，惟福州爲最。取而得之，於國防有莫大之利益焉。況清人與日本人異，苟兵力足以徇其民，則無不帖然服從！彼英、法遠隔重洋，尙不憚用兵之勞以取之，況我日本乎。……然清國素以地廣人衆，傲慢自尊；觀

日本如虜邦！……故我之入手第一著，當以防外夷之攻略爲上策。或助明末之遺臣，先取臺灣、福州二地，以去日本之外患。雖取此二地，卽我薩隅之兵已足。惟無軍艦，則不足以爭長海上，故當今之計，又以充實軍備爲急圖。……」。

現在也有人說，李鴻章對於安南之役，收拾得如此潦草，結束得如此荒唐，土地割送得如此輕鬆而巨大，縱受中外同聲的唾罵而不卹，正是因爲李氏那時已經秘密探到日本吞華的國策，巨禍將發於肘腋之間，故其外交重點，突然離法而謀日。此說是否正確？現在還無法證明。但安南之役以後，中日二國都開始競爭「新海軍」的創建，那個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要說當時日本吞華的野心，中國方面完全不知道，那也決非事實所宜有。漢學甚深、道經甚高的犬養毅氏，和孫、糜、梁，都是至交。但他也曾親向任公吐出肺腑之言：「民國紀元前十三年——一八九九年，梁氏有澳洲之遊，往別犬養木堂：

「……犬養木堂（毅）語余云：『日本今無事可做，惟將投身於澳洲大陸耳！』」

其人，帶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建山！留悲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卽余之故鄉也。……余實中國南端之一島也。……」（三十自述）。

梁氏以「數百年棲於山谷」而爲「島民」之特質，而自幼卽受本鄉過去「光榮」和「悲痛」兩大紀念之刺激，梁氏一生命運「種子於黨習」，卽奠基於此時。

二六 廬榻上的口訓

他腦海黨習中所受最早、最潔、最純和一生印象最深切，當推他祖父梁維濟的口訓。

「余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愛余尤甚。四、五歲，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賢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導進道之！……」（同上）。

後來，梁氏雖然受「黨黨」所挾持，不能始終追隨 國父以倒滿清，但他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所發表的言論，竟是一個激烈的革命黨！

「……鄙人固非有愛於滿洲人也。……鄙人雖無『一國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嘗不熱血溢湧！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及督責日亟，曾不肯即自變其說。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至當酒酣耳熱，猶時或觸發而不能自制。苟思有返焉，可以救國，而并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感焉！……」（伸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像這種明確痛快的文字，真可與當時革命黨的宣傳品的筆鋒，交相比美。嚴復批評「梁氏實爲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見「學衡雜誌」：「幾幾道與靈純如手書」）。雖然未免推獎過甚，然而他的首先發難的功績，實在是不容否認。而梁氏也自說：

「自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要『滿洲』種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國民智識程度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時學雜誌：「辛亥年革命之回顧」）。

這話可以代表當時多少青年進德會的人的意見，雖不知道；但據我的如何，卻確確實實可以代表梁氏個人當時的意志和行動。

二七 開始離鄉 學問最時了

童年的梁啓超，究竟不過是一個不見其面，孤棲山海間「島民」，然則他後來一生的政治、民族、文化、……等事業，怎樣構成的呢？他雖然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天才：六歲，五經卒業。九歲，能寫手的文章。十二歲，便中秀才。可是天天所埋頭鑽研的，不過是「八股」。雖是他自己說「八股」，然而不知天地間除了「八股」以外，還有所謂「學問」，他說：

「……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遊他縣。生十七年，乃始遊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正完全無缺，不帶離質之鄉人也。……」（夏感夷遊記）。

中了秀才以後怎麼辦呢？

「……十三歲，始知有『王調高之學』，大好之。……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

堂爲嘉慶間阮元所立，以讀書、講學爲業者也。適是乃其捨「括」（卽入股），以從事於此。然不知天竟開於讀書、問章之外，竟有所謂「學」也。……」（二十五自述）。

那時全國通行的口號，連「離了老褲」那知道鈞，叫做「窮秀才，富舉人！」「一舉成名天下聞！」中了舉人，那還了得！而梁啓超十七歲就中了舉人。主考官爲貴陽李端棻，酷愛這位青年新貴，卻因爲「偏主無雙」，打破社會地位的懸殊，就把他的妹妹許配給梁氏。並且就攜眷着同赴北京去應試。這可了不得。好得很哩，如梁啓超十八歲就點了翰林的話，那末轟轟烈烈「成成與變」的主角，沒有梁啓超其人了。而梁氏如不經過十四年亡命生涯，那末這期間可流可歌的英雄文，也不會流傳於天地間了。

下第歸上海，纔得「滬氣初辟」，才知道全球五大洲的形勢及世界萬國的部位大小，原來如此。於是索性把江南無邊局所譯的新書，大部是天、算、醫、工、理、化等著作，不管懂不懂，都擺來翻讀一頓，雖然不能消化，可是新是命和新血液，就此開始灌注入梁

氏的體中了。

第八節 康樂會接——關於思想學術政治的淵

這裏我們要說說梁氏的老師——決定梁氏半生命運的老師兼黨魁，一位過渡時代必須犧牲的失敗怪傑——叫做康有為的故事了。

二八 康有為氏的速寫

那綽號叫做「聖人爲」或「康聖人」的怪傑，他是廣東南海縣人。出身於理學名門的宦族。原名祖貽，字廣夏，號長素。少時受業於名儒朱九江先生甚久，——這位朱次琦是調和理學上的程朱、陸王兩派而不講考據的學者。康學終生以此爲基礎。但康是一位野心蓬勃、開展前途、活潑躍躍的人。而番禺又是西洋文明的精華及渣滓雜湊之地。康的前進慾與求知慾，大大感覺不夠。於是一人獨居在百樵山上四年，把那時譯出來的西洋學說，「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及耶穌經典……」等一類亂讀，又亂讀一頓

佛經，亂翻一頓九通。便自以爲「學貫天人」，思通六教，包羅古今中外，新舊世述，「內聖外王」的蓋世奇才、通人、大儒了。其實，以他的這樣毫無科學訓練的腦筋，毫無基本科學的常識，一人在山，把西洋科學、印度佛學、中國經史理學，亂讀雜翻，胡思妄想，忽然自以爲「恍然大悟」，說出來那真是「妙不可言」！他這道不過是「知識慾的衝動」，而決不是「求學問的正確軌道」。然而因其鶴立於一般「冬秀才」、「腐朽大老」之上，致養成他「子魯曰聖」的誇大狂態度，不肯隨時代前進，到底被時代所遺棄而消滅！哀哉！那時候康氏才二十八歲。

這大膽勇猛的「聖人爲」，「自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即以一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前議。……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頻上也如故。舉國流俗弄笑之、唾罵之，……先生若爲不聞也者。……」（南海康先生傳）。他「熱誠」與「膽氣」，倒真可佩服。

二九 萬木草堂的內容

康氏就在這上書不遂的時候，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門講學。這頗著一時盛名的長興學舍，雖然仍是以前「書院」的形式，而習德體三育並重和課程的分設，頗有後來文法科大學的規模。他自任「總教授」，「總監督」。另設「博文科學長」，類似教務長。

「約禮科學長」，類似訓導長。「干城營學長」，頗似軍訓及體育主。「書器料監管」，類似圖書館長。他們的課本是：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凡學生，人置一劄記簿，每日各自記述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康）爲之批語焉」（《世宗康先生傳》）。

三〇 長興學舍的教育大綱表

又記錄當時長興學舍的教育大綱，這一學表如下：

梁氏因陳子太（通甫）、曾子泰（滄偉）二志士的介紹，脫離了時的學海堂而轉學入這新鮮自由的長興學舍，且驚喜，更在這樣的「學風」與「學潮」之下，受深刻薰染者四年。

第九節 梁氏獨立事業的開始

三一 中國新青年的濫英會——湖南新政開幕

四年以後，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提學使徐仁鑄，前使江標，厲行新政。輔助他的，有那時號稱「四公子」之二：陳天華、譚嗣同，和在籍名流熊希齡等。爲培養新人材起見，特創辦時務學堂，聘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三人總主學務，梁氏又爲領袖。所有一切的學籍、學課、學風，都是脫胎於長興學舍而來，稍微加以變化罷了。

三二 長沙時務學堂的內容及其貢獻

何以評之？梁氏記「南海先生長與學記」，演其始教之言，說：

(一)立志 (二)養心 (三)讀書 (四)窮理

(五)經世 (六)傳教 (七)學文 (八)衛生 (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而他在四年以後主辦長沙時務學堂時，所公佈的學約也說：

「……一曰立志。……二曰養心。……三曰治身。……四曰讀書。……

五曰窮理。……六曰學文。……七曰樂羣。……八曰攝生。……九曰經世。

……十曰傳教。……」。

「……凡學者每人設劄記一冊，分『專精』『涉獵』二門。每日必讀所讀之書，登新義數則。其有疑議，則書而納之待問區以待條答焉。其詳細功課，別著之學校報中。……每剛日，由教習隨舉西書格致淺理，或目前事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每柔日，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問諸生以辦法，使各抒所見。(皆以筆談)。……每月以數日爲同學會講之期，諸生各出劄記冊，在堂互觀。或

有新聞，而互相批駁。上下議論，各出所得，其益無窮，凡會講以教習監之。……」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

「……時務學堂，……因中學校之曠欠。……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爲令諸生作劄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劄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劄記及批語中，至廉宜其微言。湘中一老宿，視而大譁！……起而論之。辯舊之聞，起於湘而波動於外師。編史某（按卽楊崇伊）刺錄劄記全稿中觸犯黨廷忌諱者百餘條，呈呈呈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時務學堂劄記殘卷序》）。

在這樣一種不拘形式，而朝氣蓬勃，精神充沛、樂觀的、進取的學風之下，自然能夠造就出非常奇偉的人材來。當時時務學堂第一班的學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庚子漢口革命之役，教習屠才常領導學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鍾浩、傅益祥等二十餘學生，受着孫、梁共同的指揮，聯合會黨舉義兵不成，踏着戊戌六

「君子」的碧血，而醉古仁於胸腹裏。胸之手。以上六人，就是所謂「庚子六君子」！時勢變遷第一班的學生也去了一半。那彭昭賢門徒中，最小的一位張長賓，只有十六歲，大家都很愛他，他還是我中華民族國權中人中的一位，民國護國之役殉元勳人，蔡鐸將軍。鞠徒中最窮苦的，無推范一謙，他在開國時期，終身致力於教育事業，他在中國教育界、一般文化界及生物界建設的成績是決然不朽的。此外軍事專家蔣方震（百里），也是那時四十門徒之一。其餘也不必枚舉。總之，這樣一種「設備不具」的學堂，竟培養了如蘇俄天、智量俱備的傑出人材，真是放縱着「體育英才」最大的成功。

我們試把其餘通都大邑或世界上所論教育的「洋樓官學堂」，挪來做一個對照。以「樣子」論，他們是極端矯恣。以內容論，他們是：

「……各省紛紛設學堂，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率皆最工於鑽營奔競，能俾校長更鼻息之「候補人員」也。學堂之教員，大半皆「八股名家」，弋竊甲第，武斷鄉曲之鉅頭也。……學生之往為學也，亦不過曰「此時宜裝耳！此終南捷徑

耳！與其從事於閉房退院之詩云、子曰，何如從事於當時得令之「B.C.D」。若遇人校，則張紅燃燄，以示寵榮。資派游學，則苞苴請託，以求中選。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業開宗明義第一章，而將來爲一國教育之源泉者也。試問循此以往，其所養成之人物，……可以立於今日民族主義競爭之潮渦乎？……」（新民說：論進步）。

（無怪乎嚴復、周樹人（魯迅）等，都要逃出海軍學堂，章士釗、穆湘蓀、胡敦復等，都要離開陸師學堂，此中癥結，你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三三 啓發新智的第二步驟——創學會

以上是敘述梁氏青年時代承康氏作風，所推行「維新」實際方法之第一步驟——辦學校。

辦學校，是專以培植繼起的少年子弟，是預才以期待將來之用的。如果要急切改進一般成人的智識的頭腦，啓發目前蒙昧無知的社會，那末當另求方法。康、梁所應用的第二步驟是創學會。

會社，倒是中國固有的國粹，明末士大夫還辦的復社、幾社、應社、書社，以及其他的××文會、××文社等，真像叢林一樣。矗立着，但都被漸漸入關的異種的壓道碾已來壓平了。到康有爲乃重新感得：

「……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蓋得智識交換之功，而羣團最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南海康先生傳）。

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也簡要的敘述：

「……康氏宣傳主義的方法，首先就是創立『學會』。……他在廣西講學的時候，曾經創立一個『桂學會』。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組織『強學會』；他就抓住這個強學會，推張之洞作會長。袁世凱也是強學會的贊成人。又設分會於上海、北京、天津的強學會，並得設總局。……御史楊崇勳受人譏毀，說強學會的宗旨不正當，讓即奏請把他封禁了。……後自御史胡宇辰奏請就強學會局改設書局。

李端棻又奏請推廣學校，將官書局推廣改爲京師大學，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四章第三節）。

強學會的後果，鉅大難量，雖經朝廷所封禁，卻正抬高他的身價。

「……然自是『學會』之風徧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矣。……」（南海康先生傳）。

梁氏所記，與李氏稍異，他說：

「……乙未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者南海先生，贊成者：陳斌、沈曾植、張學謙、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三

十自述）。

還是可以補正李氏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的。強學會封禁了！可是，不久（一八九七年）
（即甲午）德國強佔膠州灣的巨變又壓過來了！全國的文人士大夫，又沸騰起來，「保國」！
「保國」！——這樣地赤手空拳，高聲大喊。康有爲緊緊抓住這時機，在京師號召「保國

會」。這誰都不便再說「宗旨不正當」的鬼話了吧？於是慶氏就把保商會的組織，儘量推廣到各地方行省去：

「……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甚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勵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爲蜀學會之領袖。君（林旭）徧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戊戌）正月初十日開大會於福建會館，閩中士大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林旭傳）。

三四 長沙南學會概述

正在這同一時間之內，陳寶箴、黃遵憲、徐仁鑄在湖南推行新政，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在長沙講授新學；江標、陳三立、熊希齡等在夾輔維新。這一班人受到北京如此緊張的電報，那有不立刻響應之理！於是湖南的「南學會」大放光彩的成立起來了。譚嗣同

被推爲南學會的會長，有聲有色的慷慨論天下事：

「……君（譚氏）……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

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起；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會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譚嗣同傳）。

看了上面的敘述，知道這南學會的作用，確係比衆不同。牠的本身的意義，是「推行地方自治機構」及「政治學會」。而就這「地方」的區域性質而言，那又不叫湘學會而叫南學會。目的在「合南部諸省」，不過「先從湖南辦起」。如果真能容許牠辦到「地方有事，公議而行」八字，那末牠兼有「立法權」與「監督權」。充其量「南部諸省」早不是清廷所有了。可是，天下事決沒有如此簡單順利的，不上半年，反動的勢力，如冷豔無情的北

風怒吼雨奔，這些燦爛微弱的曇花，一霎兒煙消雲散了。

三五 「明」「暗」二力的閃電戰

戊戌（一八九八）八月政變的失敗，中國以前所有一切的微光與微溫、種子與幼芽，都沈埋在冰河深淵中了。只騰幾頭「寒冰地獄的鬼王」：——那拉后、榮祿之流——凍血淋漓，在刀山上囓中華青年的嫩骨！舉頭一竄，但見一面是無數：赤身裸體，遮着紅肚兜，畫着八卦，挪着混天大旗、引魂幡、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三尖鋼叉、八寶法物的怪東西，蠕蠕而動，到處找「洋人」來殺。這就叫做「義和團」。一面是無數怒髮衝冠、悲憤填膺的青年，懷着炸彈、手槍，甚至可以說是提着自己頭顱，踏着前人的血迹，前仆後繼的起義，這就叫做「革命黨」。除了這二種實際行動的人物以外。赤手空拳「康、梁式」的維新志士，在國內已無活動的餘地，只有亡命到海外去慷慨論天下事了。

以後所有的「學會」，都祕密含有革命的梗命，與前期的學會，性質根本不同。公車

上書式的最後一次集會，是庚子年上海張園所召開的國會，算是前期式學會的一個結束。

「當唐才常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時，拳亂方始萌芽。未幾，改爲『自立會』，謀在長江一帶起事。及至六月拳亂大作，北方名士如嚴復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國救時的名義，運動在滬各省的維新志士，開會於張園，名之曰『國會』。到會的名流，有：容閔、嚴復、章炳麟、宋恕、吳葆初、張通典、狄保元、馬相伯、賤元丞、文廷式、沈蕙、龍澤厚等，共約數百人。推容閔爲會長，嚴復爲副會長，唐才常爲總幹事。開會的時候，章炳麟當衆把辮髮剪去，表示對於滿清決絕，頗聳動一般人的耳目。其實這個會，參與分子很複雜，……大多數會員，不過震於『國會』『民權』等新說，乘興來會罷了。……」（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六章二節）。

此後集會的中心，全中國都移在上海租界上了。而會中的主角，大抵都受有國父的感召，帶有革命思想的了。譬如（1）賤元丞、秦力山……等創設『新社』。（2）章炳

(6) 韋炳麟、徐錫麟等創立「光復會」。黃興、宋教仁、楊篤生等創立「華興會」。那都是朝宗歸海於 國父的「興中會」的。

三六 推行維新的第三步驟——辦報紙

康、梁因戊戌的打擊，在國內所經營創辦的學校與學會，既掃地無餘，那末他們第三個步驟是什麼呢？是辦報。

「報」——本來是中國流行最早的，歷代的「邸抄」，就是政府公報。至於現代新式報紙，那末濫觴於鴉片戰爭以後若干年，香港及上海僑居外人所辦之報紙。應有爲已經明白知道：學校、學會、報紙，是三位一體，互相爲用，缺一不可的。所以當在北京辦強學會時，特派梁比辦報，那時所辦的報，艱苦卓絕得可敬，而簡陋幼稚得可笑。

「……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苦營於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一強學會，今大總統袁公，卽當時發起之一人也。……彼時同人……最初着

手之事業，則以辦圖書與報館。袁公曾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梁氏）。當時固無日購機器之力，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乃向售『京報』處託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張，名曰『中外公報』。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爲一數百字之短文，……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託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辦理月餘，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然詠詠騰起，送至各家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強學會遂被封禁……」（初歸國演說時：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這一事，是梁氏平生新聞事業開始的第一章；也是近代中國有正式意義的新聞開始的第一頁。梁先生晚年還親自對其昌說：「當時雖在極端艱難困苦之中，而興趣極高。有時木版雕刻來不及印，甚至間用泥版凹文代印的，其可笑到如此，而同人等對之皆津津有至味。對於這報紙熱烈幫助的，還有你們浙人張菊生（元濟）、汪伯唐（大燮）、孫慕韓（寶琦）

三公」。事歷三十年，梁先生對我開過這段故事，還是眉飛色舞。因為那時的梁氏老早已經明白：「學校的對象，是培植青年後起人材。學會的對象，是聯絡成年智識階級。報紙的對象，是啓發社會一般民衆」的原理了。所以京師的強學會，及「中外公報」，被封禁了，但這是初湧之潮，豈是人力所能遏制的！他們就轉其帆以向上海。

三七 強學報與時務報

上海的強學會分會的情形，是怎麼樣的呢？初時由會中發行一種「強學報」，經濟的支持是靠張之洞的。後來因為這「強學報」上常常不用「大清光緒……」紀年，而用「孔子降生……」紀年；這雖然可以說是模仿公廣之以耶穌降生爲紀年，但是把位頭大帥駭慌了，不得不發令禁止。這班維新志士，那裏肯休；剛剛碰到梁啓超轉帆南下，就緊握機會，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啓超、麥孟華、徐勤等名義發起，組織「時務報」。公推梁氏任總主筆。梁氏得以自由發揮其文豪的天才，也就在此報。於是聲名隆起，甚至並駕其師，而曰「康、梁」，也就在此時。更有一件趣事，梁氏的晚年學友——國際史學權威者

王國維，此時正在時務報館中當一名小書記，還沒有資格和梁氏對面談話呢！梁氏說：

「丙申二月南下，得數同志之助，乃設『時務報』於上海。其經費則張文襄（之洞）與有力焉。而數月後，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劇文襄，殆如勞工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少年氣盛，衝突愈積愈甚。……」（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明年（一八九七）冬天，梁氏反抗資本家張之洞之壓迫，使飄然遠行，溯江而西，到長沙去大會羣賢，轟轟烈烈地推行新政了。

又隔一年，便是戊戌（一八九八），梁氏重到北京，暫時脫離言論及筆生涯，參與實際政治運動，而演出一幕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血迹永不磨滅的悲劇，就是人人所週知的所謂「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了。

第三章 維新的失敗與革命的成功

——自戊戌變法至梁氏亡命



戊政變——關於這一件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我們現在處於時過境遷是非公出之後，應該站在「客觀」的地位，好好地把握這件大事，平心靜氣，探賾索隱，做一章「公平」「正確」的史文，以取信於後代。

第十節 促成戊戌變法的原因

三八 綜述

今先簡要闡述戊戌政變的原因。原因甚不簡單，爲甚綱掣領起見，可先分爲「外激」，「內根的」兩大類：

(甲)關於「外激的」原因，又可分爲「遠因」、「近因」兩大組：

(乙)關於「內根的」原因，亦可分爲「遠因」、「近因」兩大組：

茲分別備述之。

三九 外激的遠因

(A)關於「外激的遠因」，又可分下列四類述之：

(1)由於中國之閉關政策。康熙時代，那時西方的文藝復興，科學發達，都還不久。康熙帝極力提倡歐洲文化，親自學習拉丁文及代數，大量歡迎明末以來挾其科學而來傳教的。智德俱高的教士，一時中國吸收西洋文明，呈蓬勃之概。至少不在彼得時代的俄國之下。使能繼續遵循此軌道，則中國之科學化、工業化，要早三百多年！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文化地位，後來決不至墮入地獄的底層！不幸，簸弄中國命運者——雍正，因爲他私人皇位的暗爭，無端牽涉到宗教團體的暗爭。他恨一班西洋教士，幫助他「文明而又仁慈」的教敵哥哥，接位之後，把西洋的文化人，全數驅逐出國！兩扇大門一閉。從此以

後，中華全國成了隔絕世界的孤島，全體民族成了伏居土穴的鼯鼠！世界天天在飛躍的進步，而滿清宰制下的中國，「夜郎自大」，崇炫自己的文化，在那裏閉着眼睛自誇。譬如戴東原，這樣自驕自誇的學者，竟說「中國古代的算術，高出於西算」——對於西洋一切一切的進步與發明，當然絲毫都不知道。郭嵩燾說了一句「現在的夷狄也有數千年文明」的話，京師的士大夫憤怒得發了狂！一八九七年（丁酉），意大利學者馬可尼（M. Marconi）氏，已經發明無線電了；而在中國，也居然自稱「學者」的葉德輝，正在同時大講「五行之位首東南」，「五色黃屬土，土居中興；中國人是黃種，天地開闢之初，應與中位！」等童話——把鬚鬚老頭兒所說的無恥又無味的童話。如果長此閉關下去，再昏昏顛顛的睡一千年，那末又當別論。可是這緊閉的門，給英國「海盜型」的鴉片商，用鐵艦來轟得七穿八洞！逼迫你允許臥榻之旁最肥美的所在，不客氣地由他們興家立業起來。辱國喪權的憤慨以外，單就這三百年來文化的飛躍與落伍，雙方對面的對比，美醜之別，不是官子，都要感覺到無比的自愧與難堪。尤其是南方各省爲甚。不過這批八股文人，智識太

低。自私太重，素無國家民族的觀念，合羣參政的習慣（這是要殺頭的），從沒有偉大不怕死的民衆領袖，爲之代言、宣發、組織、領導，來實地行動罷了。那時忍着難堪之恥，稍有血性的文人，正苦於「羣龍無首」之時，康、梁、譚等恰恰適合那時「文人階級」中大膽不怕死的領袖。所以康有爲某一次在明楊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集合青年上書時，聯名者約二千人。戊戌政變，可以說是閉關以後，中國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優秀民族，必然奮起的鬥爭。

（2）由於鑑於俄皇大彼得西化富強的歆羨，康氏第五次上書中，已經明白地臚陳三策。上策——第一策，是：

「取法於俄、日二國，以定國是……」。

在大彼得以前不久，蒙古人奴役下的俄國，那時還是猿猴未開化的民族。大彼得正與康熙同時的，國他的不顧一切，實行歐化，居然二百年以後，躋于世界列強之林。蠶食中國的藩土——整個中亞細亞及西伯利亞，而反使中國仰之爲文明上邦。這當然是刺激中國變法

維新的一個有力因素。

(3) 由於列強之集中環攻 自從普法戰爭以後，歐洲保持四十年的武裝和平。雖然他們的帝國主義，一天高漲一天；但是他們全部「貪慾的觸鬚」，一齊伸展到遠東的老大中國來，這是他們一致認爲肥美而又豐饒一塊神祕的大地。

「……歐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世界之天府也。世界之天府，當與世界共之；非一種人之所得私也（此歐人瓜分主義）。亞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亞洲之中堅也。亞洲之境壤，當亞洲自治之；非他種人之所得讓也（此日本湯吞主義）」（論日本東方政策）。

而日本有浮田和民者，著「日本帝國主義」一書，公然大聲提倡日本獨吞中國，他說：

「……日本者，世界後起之秀，而東方先進之雄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大臣、政黨論客、學校教師、報館筆員、乃至新學小生、市井販賈，莫不口其名而豔羨之，講其法而實行之。試問今日茫茫世界，何處有可容日本人

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

這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如七八猛獸，環伺一牛。戊戌政變，是這潛力尚大的牛救亡圖存的一吼。

(4) 船塢稱利政策之失敗 遠在鴉片戰爭結束時，魏源已經深深感到外力壓迫之可畏，所以他作『海國圖志序』文說：「是書何以作？曰：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在洪楊之戰時，就有一件重要而也有趣的故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林翼）麾下爲戈什哈。……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盼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憂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嘗盲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愛而不可得矣。閏月初（敬銘）尙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

洋洋，文忠固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薛福成：「庸齋筆記」盡臣愛國條。按後來閻敬銘供給創辦海軍費，最爲熱心，殆卽根此）。

稍後李鴻章借戈登大砲之力，平定江南。他致書於曾國藩說：

「西洋炸砲，重者數萬數千斤，輕者數百數十斤。戰守攻具，天下無敵。……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砲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祕巧，槍砲輪船，漸能製用，遂與英、法相爲雄長。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

這西洋「船堅砲利」的實力，是爲胡林翼、李鴻章等一班中興元勳所親自嘗到滋味了。於是急起作「皮毛」的模仿，譬如同治四年，曾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五年，左宗棠設馬尾輪船製造局於福州。九年，曾、李又設北洋機器製造局於天津等，李鴻章的大腦中，自然充滿着：「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榛狉之俗！」（李文忠公奏議）

所以只要：

「……中國但有開花大砲、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與會文正公書）。

白晝裡那裏做這樣「黃梁大夢」，你們不要笑痛肚子。這一種皮毛維新適足更養成驕誇、懶惰、空虛的弊病。所以梁氏嚴格地批評李鴻章所行的新政，說他：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務，知有清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李鴻章傳）。

在這樣的政治惡習下辦出來的「船」那裏會「堅」，「砲」那裏會「利」！「砲彈」裏面所裝的是什麼東西，李鴻章自然是不會知道的。可是，在同時模仿新法的日本，有一個嚴酷無情的對照：駐英國公使郭嵩燾，報告說：

「……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者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十九人。嵩燾所見有二十人皆能英語。有各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法律。其戶部尚書恩廉葉歐摩，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行之。……」

而學兵法者絕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於本也。……」（『郭筠仙集』；上李中堂書）。

不錯，中國豈微有一點遠見的士大夫都看透了那些枝枝節節的「船砲政策」絕對無用；而想從「立國之本」的「各種創制」上，來一番徹底的改革與維新。這就是醞釀十餘年的維新思想，造成「戊戌政變」的原動力所由來。

四〇 外激的近因

(B) 關於「外激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項述之：

(1) 由於日本維新成功的鼓勵。此項不煩詳述。

(2) 由於甲午戰敗國恥的教訓。以自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子孫文明神胄的堂堂中華」大國，而戰敗於邊僻海島的「蝦夷」，這實在地球上真是丟得又醜又苦！全國上下「五分鐘熱度」的血液，確曾一度沸騰。尤其身居九五的少年皇帝——清德宗，真和明末的崇禎皇帝一樣，手忙腳亂，亂找宰相找到日本去了。日本變法

維新、轉弱爲強、打敗中華、吞併朝鮮的元功首相是伊藤博文。戊戌的前一年，伊藤博文適個人來遊歷，中國的可憐士大夫不管「三七二十一」，譁然主張「硬留伊藤博文做中國宰相」。竟有這樣的笑話，而居然掀動皇帝！

「清季外交史料」云：

「光緒二十四年秋，伊藤來華時，一般士大夫……多主借才變法。宗人府主事陳懋鼎奏請召見伊藤。」

其奏曰：

「……應請皇上於伊藤甫來之時，卽明降諭旨，……令其預備召見。……皇上於其進見時，宣中、日和睦之誼，詢彼國變革之序。於內政、外交，兩有裨益。……」

（卷一百三十四頁十九）。

貴州舉人傅夔，索性奏請留伊藤爲相，以行新政。其奏曰：

「奏爲維新事重，執政無人，請破除成見，留相伊藤，以聯其本，而行新政。……」

事。……臣何以謂今日中國借助變法，莫如伊藤爲宜也？日本，同洲之國，本與我同文。伊藤又日本中興之名臣，而首贊維新之治。一切制度憲法，皆其手訂。……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可否……懇祈留相伊藤，借助變法，以行新政；並請預訂年限，以操『用舍在我』之權，出自聖裁。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軍機處檔案）。

當時那班「白面文人」的哀哀無告、皇皇求援的愁苦心理；以及環顧全國的茫茫無才、渺渺無望、束手待斃的窘態，真是由這一點上流露得深刻、活躍。上述二奏乃是「病急亂投醫」、「白晝做大夢」的鑒語；然而光緒皇帝居然召見：

「當伊藤一行覲見光緒帝於勤政殿，伊藤奏曰：『外臣博文，此次來到貴國，係爲漫遊。本日蒙陛下召見，殊爲光榮。恭維陛下改良舊法，方圖富強，此於保全東亞局面上實有重要之關係。……（中略）』光緒帝說：『貴國維新以來之政治，爲各國所稱揚；貴爵對於祖國之功業，實無人不佩服』。伊藤答：『過蒙獎諭，萬不敢當。臣不過仰體我天皇帝下之聖謨，聊盡臣子之職分耳』。光緒帝說：『貴我兩國，地

上同在一洲之內，最親最近。目今我國改革，迫於必要。朕願聞貴爵披瀝其意見，請貴爵將改革順序方法，詳細告知總理衙門王大臣，予以指導。」伊藤答：「敬奉諭旨。王大臣如有諮詢，臣依實際所見，苟有利於貴國者，必誠心具陳。」（下略）」（平塚篤：「續伊藤博文秘錄」頁一二六至一二九）。

這一幕有歷史性價值的喜劇，足以證明光緒帝對於變法維新的意志如何的急迫，而尋求人材之失望又如何的悽惶。好了，隔了半年之後，有了全國文人的領袖——六度上書、名震中外的康有為，又有梁啓超、譚嗣同、楊深秀——等一班得力的幹部。徐致靖推薦了，張蔭桓推薦了，師博翁同龢又說「其才勝臣十倍」了。這還不是中國的伊藤博文嗎？梁、譚、楊等一班羽翼，這還不是中國的巖倉、大久保、木戶之流嗎？何必「與虎謀皮」，借材於四年前的國仇呢？所以光緒帝得著康、梁、譚等，真是如獲至寶！縱然康氏所上的書內有：「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大逆不道之言，帝仍一笑置之。說「康某何不顧生死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反而更加器重。所以戊戌政變，

可稱為甲午戰敗後的教訓所促成必然的結果。

(3) 由於瓜分慘禍的迫切，光緒二十三、四年（即丁酉、戊戌），全世界瓜分中國的陰謀與計畫，已達於最高潮了。俄國在東三省的軍隊，無論如何不撤。「德帝張其貪慾的餓眼」，向遠東找殖民地不得而焦躁。恰好一八九七（丁酉）年，山東膠州殺了二個德國傳教士，德帝就把它做成驚天動地的文章，因而奠定了歐、日各國瓜分中國的局面。蔣總裁著「中國之命運」，對於戊戌一年瓜分的實情與危機，有簡要詳明的敘述：

「(甲)英國 在甲午之前，列強已有在中國領土上畫分『勢力範圍』的先例。英國於割取香港之後，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中英退還舟山條約，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島給與他國』的字句。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緬界務及商務專約，亦明定清廷『不將孟連與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甲午之後，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威海衛租借條約畫威海衛為英國租界地，九龍租界條約畫九龍為英國租借地（按租借期均九十九年。九龍問題至今未解決）。光緒二十五年，英俄相約：畫長江

區域爲英國建築鐵路範圍，這時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兩省的採礦權。

(乙) 法國 法國佔領越南之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光緒二十四年又取得「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在這個時候，他無後取得延長龍州鐵路，建築滇越鐵路及開採兩廣、雲南礦山之權。光緒二十五年，他又與清廷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畫廣州灣爲其租借地（期限也是九十九年——其昌註）。

(丙) 德國 德國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膠澳條約，畫膠州灣爲德國租借地（期限是九十九年。這是開全世界破天荒的先例！——其昌註），並允德國建築膠濟鐵路及開採鐵路沿線三十里以內礦產。

(丁) 帝俄 帝俄於光緒二十二年，與清廷訂立華俄道勝銀行合同與東三省鐵路合同，畫東三省爲其勢力範圍。復於光緒二十四年租借旅順、大連灣（這是抵制德國勢力的擴張而急起直追的，所以也效顰期限爲九十年！——其昌註），並以續約取得

蘇、漢、張三帶鐵路礦山工商各特權。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畫分長城以北，爲
辛俄建鐵路範圍。

戊戌日本日寇於佔領我澎湖、臺灣以後，於光緒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
讓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帶與他國」的保證。……」（「中國之命運」第二章頁三一至三
一）。

總括於是在總結時，嚴肅的語誠全國：

「列強畫分中國各地爲他們的『勢力範圍』，亦就是作瓜分中國的準備！瓜分
的慘劇，雖未實現，而路礦、工商等權，已經被列強分割淨盡了！」（同上書 頁三
十一）。

瓜分迫在眉睫，所以在戊戌（一九九八）的春天，康氏的活動中心保國會，連張之
洞、譚世凱……諸人，都願意做發起人或會長。二個月以後，在野的怪傑康有爲，已一變
而爲帝皇心腹，最有權力的無冕宰相了。

(4) 鑒於土耳其不變法而衰弱的覆轍，當時連最爾的藩屬小國如暹羅也努力奮起，變法圖強。獨有近東的土耳其，遠東的大清，二個老大病夫，在奄奄一息的狀態下，忍受着做世界列強分割肢體的「解剖對象」！這算是懸在中國對面一方鏡子。康有為所推呈的「七」突厥（土耳其）衰亡史」，波蘭滅亡記」等歷史，聽說光緒帝讀之，有時至於淚下的。變法的決心，乃愈益堅定而迅速。

四 內根的遠因

(C) 關於「內根的遠因」，又可分下列四項述之：

(1) 由於乾嘉以來養成政治上傳統惡習的潰決。滿清中葉以後，政治、社會各方面不可收拾的腐敗，已敘述於第一章，此不復及。至於政治上的惡習，也由於清初對於漢官吏壓迫得過甚所致，一件政治如果發生毛病，漢官吏只要參與絲毫，就得負連帶責任，「革職」、「查抄家產」、「謫戍」、「斬決」、「妻子發功臣家為奴」！連珠似的「冤獄」下來了。久之，養成漢官吏發洩二項求生存的秘訣，一是不負責，二是蒙蔽掩

飾。一位終身平穩的宰相八十歲做壽時，許多門生拜請「官運亨通」的祕訣：他說這是千金祕方：「多磕頭，少說話，遇事莫出主意」。果能守此三訣，定可保證由少年時的鄉郎，升到龍顏時的宰相而毫無波折。故「不負責」三字，清代「官場經」中的天經地義。談到上下蒙蔽的惡習，我先借用龍啓瑞的一封信來看看：

「……抑某竊有進者……今之督撫，不肯擔待處分（不負責），又樂以容忍敷衍爲事（蒙蔽）。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煥飭之，使逆知一意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真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士類望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涸故，輒請動用。……爲督撫者，……夙昔援引邊摺，不能不借助於宰相；如不謬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種關係如是也。……」（龍啓瑞：「上梅伯言書」）。

地方官吏，被中樞逼誘而養成「不負責」與「蒙蔽」的惡風如此！中央方面本身如何呢？

道光時的首相曾振鏞，曾奏說：

「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惟有挾其細故之外謬者，交部嚴議；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爲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縱。」

這是嘉慶帝以蛇蝎爲心、暗箭殺人之、以吃熱血青年的陰毒惡計。當然是網用的，繼任的宰相程彰阿尤爲不堪！以致與程比同樣地位的大學士王鼎，欲揭發程氏的奸狀，乃至「先自殺」而後「尸諫」，慘到如此！然而他尸諫的遺疏，還是給程黨威迫利誘的奪去，換一個不相干的假遺疏，真更慘了（見薛福成：「庸言筆記」蒲城王文恪公尸諫條）！這類惡舉，曾國藩書曰「掩飾彌縫，苟且偷安」。這種「蒙蔽」的結果，不但國泰、王賈望、陳輝祖、伍拉納等貪款至數千百萬，皇帝不知；甚至如和珅的貪污贓款至黃金八萬萬兩，抵藩國庫十年的總收入！在未抄以前，也還蒙在鼓裏呢！這「偷安」的景象，如廣西巡撫鄭祖琛，在洪楊已起時，還在那裏飲酒賦詩。而兩廣總督葉名琛。在英軍攻破廣州時，

正在那裏「敲木魚念佛」。——粵人名之曰「六不」：謂「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由於官場而影響及民間社會，於是清末中國社會做人的金科玉律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飯吃三碗，閒事不管」。而「好事之徒」「生事之輩」，成爲詛罵危險分子的代名詞。於是數百年骯髒、踢躑、醜態、腐爛，一起積蓄壅滯、醞釀發酵起來，全中國成了一隻腥穢沖天的臭水缸！浸在臭水缸裏的，凡是血液清潔的青年，人要決破這缸而出。所以世人要「無爲」，康氏偏改名爲「有爲」。世人要「做大官」，而國父偏教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世人教人「不要生事」，而國父偏教人「你去我事做」等例，這都是要把三百年來全中國壅積的腥臭，來一個通氣、決口、洗滌、掃蕩的工作。但工作的方法手段不同；康氏所領導的「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乃是一種通氣、決口的部分洗滌工作，所以必然短期內失敗。而國父所領導的「民族革命」、「復興中華」工作，乃是根本傾覆這臭水缸，大家跳入新的空氣陽光水流之中，所以會久

遠的成功。

(2) 由於窺破滿洲民族能力的減低，滿洲民族初人關時，挾其兵農合一方銳之氣，平流寇，平「忠義的前三藩」——弘光（福王）、隆武（唐王）、永曆（桂王）；平「叛逆的後三藩」——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摧枯拉朽，當之若靡，明人驚為神兵。及至康熙帝，平喀爾喀（外蒙全部），平準噶爾（新疆全部），平衛、藏全部，及乾隆帝「十全武功」以後，那末全亞洲都驚滿洲八旗兵為神兵了。中葉後的清兵，憑其「神話式的威力」，倒仍可以鎮攝全亞，但若一按其實際，則紙老虎已經泥水淋漓，不堪一擊了。不必到道光時鴉片戰爭，這紙老虎才土崩泥潰，即在嘉慶時「八旗兵」腐敗無能的狀況，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稻葉岩吉「清朝全史」記嘉慶初清兵剿川、楚教匪的情況云：

「常備軍之腐敗，……不但『八旗兵』已也，『綠營』腐敗，亦復相同。當交戰時，雇兵、鄉勇為先鋒；漢人之綠旗營次之。其素稱驍勇絕倫之滿洲兵、吉林兵及索倫兵在最後。賊軍亦然，亦驅難民以當鋒鏑，其賊在後觀望。『鄉勇』與『難民』交

戰，而「官兵」與「賊兵」不相值！倘鄉勇傷亡，匿而不報。或稍得勝利，即取以爲己功！然與賊會之時甚稀，多不當賊鋒，如某某將軍（按卽永保），僅尾追而不迎擊，致有「迎送伯」之綽號。甚至地方村民，豫備糧餉，請其出兵，拒而不納！常求無賊之地駐軍！……」。

這就是乾、嘉全盛時八旗精兵的「武功」！再看看他們的「軍紀」：

「……軍中費用之侈，駭人聽聞，據當時從軍者言：兵餉多爲管糧員所侵蝕，實際待過士兵甚薄。聊舉一例：時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蝕五十萬兩。但其自貯，不過用以延諸將帥宴飲而已。嘗於滎澤荒麓間，供一品五六兩之珍羞。一席至三四品之多。有某尙書初至陣中，被贈以珍珠三斛，蜀錦一萬疋，他物稱是。……」（「清朝全史」上，第四十九章）。

在嘉乾、嘉之際的征剿川、楚教匪一事，已可顯著的證明滿、漢人材能力的高低。不必等待洪楊以後湘、淮軍的興起。從乾隆末年剿教匪時，負責平匪的滿洲大帥，如湖北都統永

保鏡守湖北，總督宜綿討伐陝西，福寧英掃蕩四川，不但無一不敗，且只有斬大匪禍！擬撰八、九年，而最後平定教匪的，最勇猛無敵而亦最勤勞立功的，乃反出於漢族中新迭起來的楊芳、楊遇春二將軍。此時已透露滿、漢兩民族「武德」消長的徵兆。至于鴉片戰爭時，八旗兵土崩瓦解的醜狀，甚至使英軍吃驚的。王鈞曾記當時八旗兵的實況說：

「……奉調之初，沿途劫奪。……抵粵以後，喧嘩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爲漢奸，擄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尸！……盡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聲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王鈞：「金壺浪墨」）。

漢民族初時對於滿族武力的畏懼，掃地無餘，已由「輕視」而進於「鄙視」，尤以粵人爲甚。所以秀才、舉人等白面書生，也竟敢明目張膽起來要求改變「祖宗的成法」，以求國家的生存。這是戊戌政變時能得國內多數智識分子同情與影響的緣故。

（3）由於洪楊亂後實際政權的轉移，因洪楊之亂及其平定，而清代實際政治權力，

暗中轉移甚大。以種族說，大權分於漢族。以政制說，大權分於地方。正當洪楊之盛之時，八旗兵的無用，固然是騰笑天下；而滿洲官吏之無能，也頗可遺笑後世。此時正是腐順當權時代，他倒有自知之明，知道那時滿人的洩氣，漢人的方興，這場大難，非漢人絕對不能平定，力勸咸豐帝重用曾、胡、左等一班新人，賦予相當權力，使之立功。薛福成會記：

「……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入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官文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轉告郭嵩燾。郭公聞之大驚，求救於肅順。……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

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路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略棄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文襄勳望遂日隆焉」。（「庸齋筆記」肅順進服楚賢條）。

到洪楊平後，這漢、滿兩族政治能力的實際競賽，結果揭曉，相差得實在太遠了。自此以後，滿人所死力獨霸、絲毫鬆動的政權，不得不被漢人分去了一半。至於中央政權被分於地方的因果，李劍農說得很明：

「……在洪楊戰後期中，許多人的巡撫、總督位置，全由軍功取得。一面作官撫，一面帶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等不計其數。……此後的督撫，不惟有領兵之權，並且兼有隨意編練軍隊之權。……地方練軍隊，雖須奏明，……皇帝因為急於平亂，只要地方有辦法，沒有不裁可的。裁可後即由各地方疆吏自由施行。需要補充或擴大額數時，又用同一辦法，一面奏報，一面辦理。」

海軍、海軍部是由此種程序成立及擴大的。……概括起來，清政府地方勢力，在此期中，的變化，不外兩點：一，督撫取得軍事上的實權，其勢漸重。二，軍隊由「單元職」化為「多元職」，中央失去把握之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二章）。

戊戌政變，換一個方向的想法，也可以說是漢族和平的政治革命，非在上述的形勢下，是沒有發動的可語的。上述的實際形勢，也是戊戌政變一個最大的原因。

（4）由於咸豐之際宮廷政變的結果，清廷之亡，亡於太后那拉氏一人，這是天下萬世的公評。那拉氏（即西太后慈禧太后）本為咸豐帝的侍妾。稍通文字，小聰明而性險刻。咸豐帝已深惡之；帝病於熱河，恐身移那拉氏後遭禍，半夜與肅順商議，先行賜死。時無第三人聞者，不意太監李遠英在窗外守夜，聞之。宮門已鍵，爬狗洞而出，密告於那拉氏。那拉氏即於半夜即太后寢宮，哭訴求救命。明晨，咸豐帝朝其母，太后大怒，責其何以無故殺人？帝愕然，力辯其無。此事遂寢。故那拉氏終身供肅順人骨，而愛李遠英入髓。又據「春冰室野乘」所記，咸豐帝實為那拉氏所毒弑；帝臨崩時，有人在窗外聞帝聲怒恨聲，

這呼「翠兒」翠兒「你好惡心」翠兒是孫拉氏的小名，這呼咸豐帝已發覺中了翠兒的毒手而死的。這翠兒可還懷生了一個兒子就呼「同治帝」。正后三子，後來添「東太后」。那拉氏因為「同治帝」生身的緣故，後來稱「西太后」。咸豐帝崩後遺詔，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端華胞弟）及軍機大臣中：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御前大臣領駙景壽等八人為「贊襄王大臣」。此時同治帝年僅六歲，這八人實為那時中國的最高權力者，而肅順尤為其中的靈魂。議定改年號為「祺祥」，已經鑄了「祺祥通寶」的錢了。可是不久這心狠手毒的那拉翠兒，運用她陰險刻的手段，突出不意，先發制人，把肅順處斬，端華、載垣賜死。否認「贊襄王大臣」的遺詔，發「自」太后」，違背清代祖宗三百年的家法。居然「垂簾訓政」起來，「批雞司農」，中宮從此便墮入地獄的深淵！所以這次大政變，決不是宮廷間私人之爭，而是關係全國百年的大計，漢族大臣凡是屬於肅順政治系統的，無不人人慄慄危懼，胡林翼聞此大變，就在同年憂愁而死了。曾國藩也屢次想自殺。要不是洪楊未平，這班人都會

斬草不留根的。立了兒皇帝戴溥以後，東太后稱當安分公正，西太后則放僻邪淫，無所不爲！連她自己親生兒子同治帝，也深惡他母親的醜態四播而引起強烈的反感。西太后所信任、所狎暱的，只有太監；此輩無賢，無尊，無貴，無大臣百官；至於「國家」與「百姓」，那即使分解她全身每一顆細胞都是找不出來的！天地之間，只有她與太監。自從東太后授意丁寶楨殺了太監安德海以後，這位老姨太太不耐煩了，她就再展前此「謀殺親夫」的秘訣，毒死了正宮死太后。這是懷毓照「崇陵傳信錄」記載得很明白的。從此以後，中國最高的政治權力，表面上是屬於兒皇帝一人；事實上却在西太后一個人手裏；骨子裏却屬於太監李蓮英一人。所謂「議政親王」、「軍機大臣」，一齊都向這「皮哈李」（李蓮英的綽號）垂手低頭，連聲道「是！是！是！」而退。以中國五千年悠久的文明，三千萬方里博大的土地，四萬五千萬優秀的人民，而把這全副命運，放在一個目不識丁、鴉片入骨、不陰不陽、非人非物的怪東西——皮哈李手裏。嗚呼哀哉！漫說全國，不論何種階級，上至帝后（包括東太后、同治帝后、光緒帝后在內），下至平民，一級痛恨西太

后，又貴族，更甚於漢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耳，成敗政體，就是國中再敢不畏死的青年，企圖與皇帝合作，起而推翻西太后與李鴻章統治的政治革命！

四二 內根的近因

(D) 關於「內根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項述之：

(1) 由於「帝」「后」本身的爭權 從上述「遠因」(4)「取」改變的波浪下來，同治帝親母子之間，惡感日深。西太后真是個「惡婆娘」，甚至干涉母子媳婦的燕好，同治帝憤而外遊，得不名譽的病而死。西太后憤親生子不孝，不爲他立嗣，使同治帝絕代。齊默庵史吳可讀先行自殺，然後以遺疏「尸諫」，請爲「大行皇帝立嗣」(剛死的皇帝稱大行皇帝)：白白犧牲了生命，除了令人作嘔的「傳旨嘉獎」以外，一切完了！西太后於是重立一個更小的兒皇帝，是親親妹妹所生的，只有四歲的載湉——光緒帝。當開分謗的御前會議時，有人主張援立溥儀，西太后厲聲斥責：「溥」字輩一概不要！這一吼，嚇得親王大臣面面相覷，誰敢逆「河東獅」的淫威！一個「啞啞」避聲而退。這一來，把一

位天真活潑的小朋友，生生死死入紫禁城的牢獄中去，判了長期徒刑三十四年，而後「就獄正法」！這就是光緒皇帝的生活史。西太后何以至極「溥字輩一概不要」呢？這裏有三個秘密原因：（一）最大的一著，是知「專制到死主義」。立了「溥」字輩，她的地位是「祖母」了，是「太皇太后」了，那時老臉再「難看情」垂簾訓政了。所以仍立「載」字輩，總以「養母」及「皇太后」資格，「專權專到死」！（二）總共的原因，依然是「專制到死主義」，如果立了「載」字輩的年長的人，他便不服從你指揮了。所以抓到只有四歲的小孩，那便是「和李蓮英的玩物了」。（三）最後是她對親生子的洩忿主義。若立「溥」字輩，就是默認是同治帝之後了。偏立「載」字輩，他這不孝親母的「忤逆子」絕嗣。光緒帝做了二十年囚徒；而有甲午中日戰爭的大敗。這二十年中間的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百孔千瘡，實難盡記。這「青年皇帝」——不，「青年囚徒」！眼看國家是快要亡了，而「親爸爸」和「皮肉李」的荒淫，反日甚一日！要忍有所改變而救而手無寸柄，鯁寡孤獨，除了一位七、八十高齡的老師傅——翁同龢以外，茫茫宇宙間，

竟舉目無一個親人！又忍無可忍，悶悶地寫做四年囚徒，到了戊戌年，忽然上天降下了一個怪傑康有爲，領導了一批少壯青年都及數千人附和的青年羽翼，及全國翕然同情與輿論，肯自動替他辦了這個「寡人」來變法維新，他真定歡喜得有「感爾上蒼」「天佑中國」的心緒，所以信任康有爲的徹底及變法動作的迅速，真是古今所罕見的。「百日維新」所以突然如火燄一般的怒起，這是一個最大的近因。

(2) 由於滿族嫉妬漢族情感表露化 據上述，光緒帝因急欲解除其囚徒的地位，而真正取得「皇帝」的權力，不得不完全重用漢族人才，以達成其目的。洪楊亂平，捻黨又清，新疆收復，回亂重定，大功多出於漢人。滿族此時已深深感覺到漢族本質的優秀，能力的高強，而本族乃有根本生存的威脅，嫉妬、憤怒、恐懼，而無可如何！今見皇上又一味重用漢人，不平之氣更甚。兇悍的滿人如剛毅、榮祿，且明目張膽昌言排漢。退在漢人豈有不知之理，梁氏的著作內就敘述甚詳（均見下）。但西太后和李蓮英的荒淫政治，對中國固然是推入地獄。對滿族，豈不是更打入泥犁嗎？所以譏大體的少數滿洲人，也竟

有同情于光緒帝及漢族青年之維新變法運動的。譬如楊深秀的密友文煜：

「御史文煜者，滿洲人也。以補入久居內地，知宮中事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粵、旅（之役）後，慮屬危。文君自下有某人請（按即大刀王五），撫北方義士千數百人。適同後嗣，文君請君（楊深秀）宮中隱居，皆西后所忌之等也。文面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皇）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於后，欲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於程宗則爲生母，於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當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楊）然之。文又曰：『我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溥貝勒（按即溥澍，同治帝有遺詔欲立之爲終者），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祁寒，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皇）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顫！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眦欲裂。君（楊）美其忠誠。（文）乃告君（楊）曰：『吾少喜慕游俠，能識牖，撫有堪憐奴心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譏豪傑，能寬其人以救國乎？』君（楊）壯

其言而慮其難。……」（孫深秀傳）。

可見當時主張「革新」「改革」的志士，固然是以漢唐為中堅，但也有少數的流入秦八。而「守舊」「保守」分子，固然多屬於滿族的朝貴，而漢唐的敗類，如所謂「楊崇伊之流」，也無恥的作僕。老實說：到了戊戌年間，維新派與頑固派，對於統治中國政體的爭奪，已經走到「圖窮匕現」、「短兵相接」的階段了，因之僕因這一類的逆變了這「百日政變」刀光血影一幕歷史上精彩的悲劇。

(三)由於 國父領導革命運動的充進 概括地說：它清光緒的三十年來間，中國人的思想變遷，約可分四個時期：統緒初年至甲午之戰，是以李鴻章為中心時期。從甲午之戰至戊戌政變，是以康有為為中心時期。從戊戌政變失敗至日俄戰爭，是以梁啟超為中心時期。從甲辰帝俄戰敗至辛亥革命，是以 國父為中心時期。但此只是就中上社會及智識分子的面面部分而言，而實際上 國父所領導的革命工作，已逐漸深入人心，彌漫全國；朝廷亦不得不承認這才真是「致命」的隱憂大患！在初時，八股秀才們不免認「孫汝為紅塵

毛、綠賊賄餉公道大王」(吳稚暉先生語)。但幸戊戌變革之間，國父「驅除殘廢，恢復中華」的宏明大義，已逐漸實自於天下。國父自說：

「……終此(庚子乃州之役)失敗以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以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咸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以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語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舉之不成矣。此後輿論，差若天淵。吾人觀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漸醒之兆」(建國方略)。

戊戌與庚子，只差二年，而國父之革命風潮，已澎湃如此。清德宗長子一部分之臣，自然感覺國變法維新，自可而且保全宗社；這是「善取其經」的原則，所以全國地廣行變法政綱。

(4)由於國內輿論傾向維新之逐漸成熟，上章已述甲午以後，國內各地各種「學會」已

風潮澎湃。這種「學習」，都是造成維新黨與革命黨的原因。同時西洋新學說，無一不遇的如潮水浸入，國內的民智無可封鎖地日趨開啓。決非老舊官僚張之洞的「勸學篇」，冬烘學究葉德輝的「萬教宗廟」等護教著作所能挽回。而同時旅華公正之外人，復「啓發中國民智之事，而偉面之努力」：稱萬氏云：

「……此時在上海之外人，乃對於民間風氣，革新而樂爲助力。其最著者則「廣學會」也。廣學者，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在中國之英、美官教士及學士等所組織。其中知之者，以林樂知、丁韋良、慕維廉、艾約瑟、李佳白等爲最著。其目的在啓發中國之新智，而翊中國之自強。其最初在翻譯新書，發行雜誌。如『泰西新史攬要』、『文學與醫策』、『治國要務』、『自西徂東』、『列國變通興盛記』、『萬國公報』等，皆有喚醒中國之價值。……廣學會知中東戰後，中國漸有覺悟，乃派李提摩太於北京，周旋於名公鉅卿之間，講善後之策。當時推李提摩太爲官書局教習，固辭；其言曰：官書局教習之地位，……所成就不過數十百人。……不如爲廣學

會靈力，擴大其規模，以培養將來中華之人才，資助智慧之發達也。……」（「清朝
全史」第八十二章）。

所以到了戊戌年間，維新運動，已呈「瓜熟蒂落」的現象。除了其無恥、賣身求榮的少數敗類以外，都可以說是渴望政治改革有如甘霖的了。

第十一節 戊戌政變史劇的繪影

上述「戊戌政變」的內、外、遠、近的原委因素，以及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各種背景環境，都加以綜合的、宏觀的詳述，讀者也早已了然「戊戌政變」的真實性質了。再回頭來看經過的事實，自然更容易心領神會，徹底瞭解了。這一幕悲壯、縮短而重要的史劇，其經過的史迹如下：

四三 痛哭流涕時代的最後請願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因德人的強佔膠州灣，引起俄人立即強佔旅順、大連灣，英人強

佔威海衛、或三角，法人實佔膠州灣，甚至有人也實佔佔三都澳，國人火驚，看見瓜分之刀已在頸上，奔走號呼，「保國官」之類便在各地湧起。幽居深宮的二十九歲皇帝清德宗，也憂愁得要死，問他惟一「親信人」老師傅翁同龢，到底還有什麼辦法沒有？老師傅實在太老了，難言「起死回生」的重肩，於是進薦六度上書、名滿天下、羽翼豐滿的新進士康有為。同時徐世昌、張蔭桓、李鶴蓀、高燾曾等一班大官，又疏薦康氏，康氏又復痛哭流涕的最後一次的上書，有激刺的透論，及詳備的規畫。梁氏扼要說着：

「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大變』。又曰：『變事而無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不徒無耳』。故先生所條陳三書，其意全在：請舊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法，立民政局以行地方自治。其如：一、海軍，興學，置憲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

(政變原因答客疑)。

又請派滿、漢種族之界限：梁氏又記：

「……康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滿漢不分，居民同志』。斯言也，滿洲全部人所最不樂聞者也，而我皇上深嘉納之。……」（論辦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光緒帝全部接受了康氏的意見，隨即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議是。於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康氏，即任命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又召見梁氏，即賞舉人梁啟超六品銜，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在帝的本意，自然要以更重溥的位做界于康、梁，可是二品以上大員的點步，都要回和園請命；那麻煩了。故暫給以小官，而實賦予大權。從此以後，康、梁便得發舒其胸中的抱負了。所謂「戊戌新政」、「百日維新」，便自此開始了。

四四 新政要綱一覽

但政變雖然開幕以後，所演的戲可並不偉大！舉其重要節目如下：

(一) 命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均用四書文者，以策論。

(二) 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試。

(三) 停止朝考。

(四) 命刪改各衙門則例。

(五) 命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

(六) 下裁汰冗官令，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並東河總督缺。其各省不辦邊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亦均裁撤。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

其餘尙有不成片段的小新政，從略不舉。卽此淺淺的新政，在我們今日看來，不得而隱國民的政治理想，有隔世之感；比較日本明治維新的規模，有天淵之別；卽康有爲所上的條陳而言，也還有千里之差。然而在清德宗看來，却總算是大刀闖斧的了。就是上列一樁

新政，從四月行到七月中旬，似乎行得順手起來，至前慶邸（京。廣義士論：「內閣官制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縣譚嗣同，均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在軍機章京行走」。這是名震一時的「四京卿」。梁氏說：

「……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志一行大改革矣」（譚嗣同傳）。

於是在七月二十七日，光緒帝宣布帝堂皇的上諭：

「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爲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屢勸，故可以補我所未及。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善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命，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無所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爲堯舜而奇，乃登懷柔子，普上天之所異，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今將憲法之重，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維中國，朕不勝厚望焉」（「愛國論」所引）。

四、廢折毀警報

此時說得是英法德意俄美各國到頭點的時候了吧！在此以前，光緒帝親乘一輛淺淺個等差大臣，立一鐵一主子的威風，便指一件事把禮部的禮、禮部會同侍郎——都是最腐爛分子，被拆布、許厚麟、蔣、溥、徐寶澂、曾廣瀛，一齊革職。那會同侍郎布內妻，是侍奉太后得寵的老媽子，便向「老佛爺」哭訴起來，「老佛爺」於是勃然大怒，光緒帝便怕懷害怕起來，擴梁大連：

「（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譚嗣同傳）。

據傳：即所述：

「譚、楊憤上之受制，頗有不平語。上手詔答之，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何。然卿曹宜與處其間，使國富兵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於是蜚語漫聞於百朝」（宣統雜錄：「崇陵傳信錄」）。

四六 譚·袁半夜的壯劇

那時德塔及漢奸楊崇伊等早與榮祿陰謀廢光緒帝。驟走狗李鴻章奏請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榮祿因以武力實行廢立。帝明知天津便是他日已「正法的刑場」，可是不得不下諭九月奉太后至天津閱兵。康有為這班人真急慌了，怎麼辦呢？不得已想到求救於袁世凱。

「君（譚嗣同）與康先生稔詔（衣帶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譚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諳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

譖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委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在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旣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盡弄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中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旣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

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譚嗣同傳）。

這一幕精彩而悲壯的話劇，應該在中國近代史上放一異光。可是，這裏袁世凱所表演的，固然是神采活現的英雄本色，但却不能不啓世人疑心，榮賊的陰謀，本應該在九月裏才發作；何況八月初三夜這幕史劇演完以後，初六日事變就突然從前發作？所疑者甚多的人，都說這又是袁世凱賣友首告所促成的。所以光緒帝至死恨袁世凱入骨；而袁世凱自己也會有「臣，賣君之罪人也」的良心懺悔語；是不爲無因的。

當譚嗣同熱烈期望袁世凱救主之時，但林旭即不謂然。據梁氏所撰的林旭傳說：「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踴號呼。時袁世凱方在寢，謀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千里草」，是東漢末年一首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千里草」合成「董」字，「十日上」合成「卓」字。本初是袁紹字。這裏借用董卓、袁紹的故

事來比喻靈福祥與袁世凱。其思是謂：這靈福祥，亦惟是袁世凱之流，挾天子以脅靈後，那真不可收拾了。

四七 皇帝成俘虜了

初六日，光緒帝就被拘禁到頤和園中的玉瀾堂。太后垂簾主政。逮捕張蔭桓、徐致靖及名振一時的六君子。

「自四月以來，京師謠言，皆謂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見臣工，固未嘗有病。及革禮部六堂官，擢兩京卿；懷塔布及御史楊崇伊等先後至津，謁榮祿，遂相與定謀：檄調靖士隊軍五千駐天津。又命董福祥軍移長辛店。三次急電至總理衙門，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英艦七艘泊於天津，請飭袁世凱回津防禦。世凱至津，榮祿即乘專車抵京。與懷塔布、許應騾、楊崇伊、張仲忻，至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請訓政。太后立命以榮祿之衛兵守禁城。令榮祿仍回津以候召命。會至夜半而散。翌晨，新黨謀圍頤和園之謠起，太后垂簾之詔下。」（自注）先是，太監於茶店中創一種風語：

言帝設謀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多深信之，互相傳播」（清史記事本末）。

至於光緒帝被擒的情形，僅就鼎記得甚慘：

「御史楊崇伊、龐鴻書，揣知太后意，潛謀之慶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村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初四（六）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韋疏播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嘶嚀曰：『我無此意』。

太后睡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機爲詞，隨朝訓政」（崇陵傳信錄）。

就把光緒帝囚禁於頤和園中的玉潤堂。凡是游過頤和園的人，都可以在玉潤堂憑弔，寫一宮院左右美麗的配殿，屋中打了一通烏黑而堅實的佛牆，醜怪得要死，至今尙未拆除，這便算是近代史上這類的史蹟。

四八 廢立陰謀與「單片請安」

過後，西太后一定怎麼掉光緒帝，說帝病危，把藥方開示給天下公閱。她何以要多此一舉，把藥方公佈於天下呢？這意思並不是證明她的人格的不撒謊，乃是有實力上的顧慮，要看着天下督撫的眼色。上面已經說過：洪楊以後，清代政權暗移，中央則分大權於地方。軍權與地方財政權，則均握於各大督撫之手。儼然是方面千里的大諸侯，倒不好隨便開罪的。各省官吏人民，對於廢立之事，那是人人憤憤填膺，可是有什麼和平方法去挽救呢？最後兩江總督劉坤一，到底給她想出一個絕妙的和平挽救方法來了，即所謂「單片請安摺」。原來自同治元年以後，所有全國大小臣工奏疏，總要加「恭請皇太后、皇上聖安」。或「伏懇皇太后、皇上聖鑒」。絕對不許單提「皇上」一人的，三十五年中絕無例外。此次劉坤一以伏讀藥方為藉口，單片「恭請皇帝陛下聖安」！既不得罪西后，又表示兩江的大吏與人民，都忠愛於光緒帝。據說：這是浙江名士湯壽潛所設想的。後來頗有幾件「單片請安摺」上去，李蓮英和那拉后看見風色不佳，決定把這「癡兒」暫時圖禁起來。

再說。

至於康、梁這一般「小人」，在西后自然要把他們立斬處決，才洩「奴家」胸中一股無名之火。可是「洋鬼子」可惡透頂，首逆康有爲已經早一日受英使館保護，並且特派兵艦由天津送來香港去了。次逆梁啓超、譚嗣同，又由日本使館用綠呢大轎，接到他使館中保護去了。李蓮英和那拉后於是恨「洋鬼子」刺骨，東洋小鬼割朝鮮、臺灣，她沒有覺得什麼可恨；只有保護「逆賊」梁、譚，這才是不共戴天之仇。二年後庚子之大殺「東西洋鬼子」，其導火線即伏於此。

四九 譚嗣同精忠壯烈的考證

其中譚嗣同精忠壯烈的行爲，尤爲可泣鬼神，可風百世。他本可以如梁氏一樣，由日本嚴密保護，安逸地送往東京。可是他已經入了安全地帶，又重新自動出來，願拋頭顱，以敬造祖國百年的命運！這種「忠」而「俠」的行爲，中國已經數百年見不到了。

「……旋聞垂簾之諭，君（譚）從容語余（梁）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

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入日本使館，勸余同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相傳即大刀王五，但未至）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致聲，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爾開始！」卒不去，故及於難。……於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譚嗣同傳）。

這壯烈史蹟，民國十六年夏，梁先生親和其昌再講一篇，從黃昏直講到天亮。已經隔了十五年了，梁先生還是老淚橫橫，其昌也不覺熱淚奪眶。譚嗣同氏在百忙中間，還代他的父親譚繼洵，先上一個「點革忤逆子嗣同」的奏片，使他的老父免於罪戾；他真是忠孝兩

盡。他在獄中，又題一詩於獄壁，曰：

「蒙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張儉是譬喻他所懷念的康南海。杜根，也許是暗指他所期待的某俠士。這首詩，立刻電傳到日本，日本立即爲它譜出曲調來，令學生們歌唱。因爲這件事的本身太可感動人了。

五〇 千秋肅敬的劉光第父子與林旭夫婦

其他同時五君子的義烈行爲，也實在可泣可歌。譬如梁氏的「劉光第傳」記他們父子殉國：

「君（劉）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

三十五年後梁先生親爲其昌追述當時的情形說：「裴村臨刑，其嗣子不過十四五歲或十六歲，倉卒確知，別無法救；趕赴刑場向監斬官剛毅叩頭流血，請代父死，不允。既斬，抱其父頭而哭，立時嘔血，半夜而死。……聞之酸鼻。又記林旭夫婦殉國事：

「君（林）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雖親人都收道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林旭傳）。

五一 康廣仁楊深秀楊銳三君子的忠烈

又記康廣仁獄中詰誠程、錢之氣概：

「……君（康）從容被逮。與程、錢二人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

程、錢曰：「吾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特恐吾等未必死耳，死則中樞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康廣仁傳）。

其他如記楊深秀：

「忠誠之氣，……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楊深秀傳）。

而記楊銳則云：

「……叔嶠……（銳字）尙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這一幕歷史上不朽的名劇，在北京的，以「黃匣」「硃諭」始，以「銀刀」「碧血」終，從此草草告一結束。至於梁任公本人呢，由日本公使林權助受日政府令，嚴密保護；揚言「日本欽察大臣因眷國國」，衛士呼殿，婢媪圍繞，不令人窺。用專車送至塘沽，更由大島兵艦，由塘沽直駛東京。在東京過他另一套亡命的文豪生涯去了。

第十二節 政變失敗原因的解析

至於戊戌政變所以失敗的原因，大概可以說是先天的、命定的、必然的、無可倖免的歸宿。其原因實在最顯而易見的。隨便舉例來說，即有下列各項：

五二 由於清德宗的無權與無能

這也難怪他，他自四歲起便在這紫禁城的牢獄中受李蓮英和西太后淫威的脅制，畏懼恐怖的心理，已經深深打入下意識中，滿清的親王朝貴，沒有一人把這可憐的皇上，放在眼

異。每一個太監，都是監視他的偵探。他早已和漢獻帝、魏高貴鄉公，處於同一的地位。以如是的地位，而想奮發圖強，大有作爲，根本已有「緣木求魚」之感。譚嗣同輩初時還裝在鼓裏，梁氏說：

「……初，君（譚）之始入京也，輒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今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譚嗣同傳）。

此點康廣仁最有先見之明，早已洞若觀火，他在戊戌春間就說：

「我國改革之期，今尙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聖國之人材，尙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

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

他的卓見，未被與高采烈的「阿兄」及卓如採納。到七月他又剴切地說：

「……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天尊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康廣仁傳）。

這可說明戊戌新黨，自己也知道必然失敗，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

五三 康有爲爲本身的缺點

康有爲對於「當領袖」的根本資格，其優點是：一、魄力偉大，二、精神勇猛。三、感情豐富，四、毅力堅韌。但他的缺點較多：一、胸襟不廣，二、態度傲慢，三、個性執拗，四、理智不強，五、作事無序，六、缺乏科學訓練，七、本身不求進，八、所學太亂，不適用於其時代（已詳第二章）。而反驕然不慚，自謂貫通天地人，不免可笑。他在

「百日維新」期間一生最精彩得意的生活，爲他的頭腦冷靜理智較強的阿弟，對此有生動的描寫及切中的批評。說：

「……伯兄（康有爲）晝則講學，接見人士日以數十，戶外屢滿。夜則代草奏稿，設言路，及館上摺者上言。及四月，伯兄召見後，上奏及見客益忙。夜又改定『法蘭西革命記』、『突厥削弱記』、『波蘭分滅記』，因頻奉上命索取，故弟須一切照料，晝夜高權。伯兄草文，皆夜深高臥，誦之於口，而弟平之於書。其有宜商者，卽與弟辨議。卽寫成摺，夕上面朝行！故弟亦忙極不能行。……」（『戊戌六君子遺集』康幼愷茂才遺文：致口易一書）。

當時康有爲的生活，如此的忙繁、紊亂而倉促，縱然精力過人，其成績也自然不會佳的。他之弟對於乃兄的批評，尤爲公允而有味。他說：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辯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故常謂但能錫刀

廢八股 俾民智開，則危崖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知願，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多謀無益，且恐禍發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翁同龢）告以上卷至篤，萬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弟且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決無成功，何必冒險！伯兄亦非不深知，以為生死有命，非所能避。……」（同上）。

以上真是語語洞中肯綮之言，他又指出乃兄性格的缺點，說：

「伯兄思高而性執，拘文牽義，不能破絕藩籬，至於今實無他法，不彈伯兄才任其難不能行，即弟向自謂大刀闊斧，蕩夷叢澤者，今亦明知其危，不忍捨去。乃知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固有無可如何者。……」（同上）。

即梁氏本人，對於戊戌政變失敗的原因，及「主動」領袖不可避免之缺點，亦有公正、平允、精到之自白：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當時舉國人士，能知

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視肘巨擘，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能遊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畫不能盡得其竅；殆勢使然，不亦爲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義爲主；務在發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採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在，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南海應先生傳）。

據梁氏的理論，則戊戌政變，本來是從失敗中以求成功。即失敗亦即成功。以失敗促進成功。即譚氏之慷慨自願滿熱血以洗中國之腐政，亦熱烈的懷望若此意耳。

五四 滿族之嫉妬排斥漢人而破壞

自洪楊平後，酋后即以積極制中興大臣爲惟一政策，故彭玉麟等可解除兵柄，至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退省庵中做一漁夫，而絕不肯至京任兵部尙書。梁任公嘗歎息着說：「中興諸勳臣，所以不能與維新之治者，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曾國荃初復江南，旋即罷職閑居，曾國藩之膽於是寒矣，左宗棠班師入覲，

解其兵權，召入樞垣，陰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餘百端，無不類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氣，而無能爲役也。……」（中國積弱溯源論）。

聖於在捻、苗平定以後，戊戌政變以前，這一段期間，正是事實上漢人立軍功、握政權、地方督撫分取中央大權之時，此時，一些無知而滿人嫉妬憤恨之氣，鬱而未發，但時時流露。譬如：

「昔有某西人語其親王曰：『貴國（清）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聘於疆場，盡整頓！』其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中國積弱溯源論）。

「兇悍的滿人，更公然造作妖言，危詞聳聽，公然昌言以排漢：

「不寧惟是。滿漢界限之見，日深一日。……逮於近年，遂有如剛毅輩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之十二字謠以亂天下！……」（同上）。

適於戊戌政變之前夕，則「防家賊」的聲浪，愈唱愈高。梁氏自述：

「夫滿、漢之界，至今日而極矣。……滿人……無端忽焉畫鴻溝以限之曰：『某

事者，漢人之私利也。其事者，漢人之陰謀也。雖有外患，置之不顧，而儘以「苟家賊」爲言！矣國家既以「賊」視其「民」，則「民」之以「賊」自居，固其所也。……」（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彼滿人既侮辱吾全體漢族爲「家奴」、爲「家賊」、當滿廷之割土地於異國時，他們所承乘惟一的政策，爲「寧與仇人，不與家奴」！此又清末全國人人所深知者。而其設兵的對象，乃專以唐殺我漢族——「家賊」爲目的！這樣看來，則康、梁等謀戊戌維新，不但命定的絕對失敗，且覺何必多此一舉，只有「以賊自居」以武力革其命耳。

在「百日維新」期間，滿洲人鬧鬼的趣事，尤爲笑話百出：梁氏說：

「滿人之仇視皇上也，謂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

「今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滿人之阻撓變法，感於斯言也。……」（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在這樣受滿人擠排、壓迫、攻擊之下，「維新救國」，「變法圖強」，真是一個荒唐的幻

五五 守舊分子的死力阻撓

不惟一事無成、感覺生存威脅之滿洲國貴視變法維新有如蛇蝎，即中國之「準漢奸」，全祿位、保妻子之大小官僚，亦視變法維新爲「打破飯碗」之禍根，故亦出此力以反對。況中國自雍正、乾隆以後，壓抑民氣、愚蒙民智之政策，無所不用其極；百年之後，甚至整個民族的「人生觀」，亦爲之改變！梁氏所謂：

「……乃今世之持論者，……曰安靜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譽人之詞也。

曰喜事也，曰輕進也，曰紛更也，皆貶人之詞也。舉之莫敢廢，廢之莫敢舉。一則曰依成法，一則曰查舊例，務使全國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於墮然不動之域，然後已！」（中國積弱溯源論）。

譚嗣同更痛切論之云：

「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譚妄喜』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

閱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奮氣』之論起，柄權則顛奪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統政府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可保也！」（仁學）。

在戊戌以前，既以是爲牢不可破之「國是」；及新法既見之實施，則彼輩更感覺實際的切膚之痛了。此中癥結，梁氏亦早已深知：

「……今守舊黨之直捷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移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絕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然猶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能獲也。今者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奢極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謚『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隨一品之蔭。若一日變法，則

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故反覆計較，莫如出死力以阻撓之。盡全國千萬數之守舊黨人，不謀而同心，異隊而同辭，他事不顧，而惟阻撓變法，……未有艾也。……」（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梁氏乃欲仿日本明治維新安置封建藩侯之法，以高位貴爵不視事而坐食厚祿以處置此輩，無奈清德宗之絕無寸柄啊！

「我欲望魯兮，龜山蔽之。」

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

潘公展
印維康 主編

勝利出版社印行

第三輯 學術先進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第一輯 民族偉人	
老 子 墨 子 孫 武 屈 原 司 馬 遷	管 仲 仲 孫 子 李 斯 班 固 諸 葛 亮	黃 帝 夏 禹 孔 子	書 名
張 默 傅 斯 年 楊 杰 梁 宗 岱 汪 辟 疆	王 儲 衛 聚 賢 朱 希 祖 黃 文 弼 祝 俠	錢 含 英 張 含 英 黎 東 方	作 者
莊 子 王 充 朱 熹 徐 學 士	王 岳 文 鄭 文 公	秦 漢 唐	書